

當代中國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SU

吉隆坡 马来西亚
Kuala Lumpur Malaysia
Vol.2 No.2 October 2015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UNIVERSITY
OF MALAY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ISSN 2289-7534



9 772289 753007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Volume 2, Number 2, October 2015
第2辑, 第2期, 2015年10月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社长

黄子坚

主编

潘碧丝

副主编

林德顺

行政主任

林燕萍

编辑助理

邓佳玉

朱锦芳

编辑委员会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阿睦 贺艳青 李冉 张森 张添财

国际编辑委员会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石之瑜 台湾大学	江柏炜 台湾师范大学	庄国土 厦门大学
李宝平 马来亚大学	李锦兴 马来亚大学	吴小安 北京大学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	单宝顺 浙江理工大学	饶兆斌 马来亚大学
袁兴言 金门大学	聂珍钊 华中师范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潘小慧

辅仁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airman

Danny Wong Tze Ken

Editor

Fan Pik Shy

Deputy Editor

Ling Tek Soon

Administrative Officer

Susie Ling Yieng Ping

Editorial Assistants

Deng Jiayu

Choo Kim Fong

Editors

Ahmad Murad Bin Abdul Halim	He Yanqing
Peter Chang Tian Chai	Li Ran
Zhang Miao	

International Associate Editorial and Advisory Board

Bo-Wei Chiang <i>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i>	Chih-Yu Shih <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i>
Cui Zhiyuan <i>Tsinghua University</i>	Lee Kam Hing <i>University of Malaya</i>
Lee Poh Ping <i>University of Malaya</i>	Ngeow Chow Bing <i>University of Malaya</i>
Nie Zhenzhao <i>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Pan Hsiao-Huei <i>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i>
Shan Baoshun <i>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i>	Shing-Yen Yuan <i>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i>
Wu Xiao'an <i>Peking University</i>	Yang Xuedong <i>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i>
Zhuang Guotu <i>Xiamen University</i>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Volume 2, Number 2, October 2015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第2辑, 第2期, 2015年10月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in 2015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87,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z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sha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and claims for damage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are solely those of the authors. They do not reflect that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Typesetting by Wong Yee Chen

Print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University of Malaya, Lembah Pantai,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Please visit the CCS homepage at <http://ics.um.edu.my/?modul=CCS>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s an academic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focusing on related issues about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nuscripts for consideration and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ent to: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79565663

Fax: +(603) 79565114

E-mail: ccs2014ics@gmail.com, chinastudies@um.edu.my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nts 目录

- 内蒙古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衰退成因分析 / 白 萍 001
An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in the Mother Tongue of Russian
Ethnic Group in Erguna City of Inner Mongolia / Bai Ping
- 亚洲对帝国主义的回应：孙中山和马哈迪反帝国主义
论述比较分析 / 陈中和 011
Asian's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r Sun Yat Sen's and Dr Mahathir Mohamad's Anti-Imperialism
Discourses / Chin Chong Foh
- 真实生活的抒情体现 情感需求中审美表达
——藏族民歌中的民俗事项透析 / 栗 军 053
Lyric Embodiment of the Practical Life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Emotional Aspirations -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olk Items in Tibetan Folk Songs / Li Jun
- 试论当代中国之“盗墓文学” / 黄 华 067
A Discus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omb Raider
Literature" / Huang Hua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nts 目录

- 撒拉话能维持吗? 081
——青海循化县撒拉话使用研究 / 潘碧丝
Can Salar Language Maintain? – A Research on the Use of
Salar Language in Xunhua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 Fan Pik Shy
-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介绍 097
——东南亚诸国（1949-1965） / 吴尔蓓密、沈志华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C's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Declassification of Diplomatic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1949-1965)
/ Wu Erbeimi & Shen Zhihua

内蒙古额尔古纳 俄罗斯族母语衰退成因分析^①

白 萍

内容摘要: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是中国俄罗斯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这里的俄罗斯族多为十月革命前后迁居该地的俄罗斯移民与中国汉族结合的后代, 其母语俄语退化十分明显, 原因主要为政治因素、俄汉通婚、传播渠道和语言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族; 内蒙古; 母语; 衰退; 成因

作者简介: 白萍,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语言学、俄语方言学。邮箱: verabp@163.com

Title: An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in the Mother Tongue of Russian Ethnic Group in Erguna City of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Erguna city of Inner Mongolia is one of the main settlements of Chinese Russians, who are the descendants of Russian immigrants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obvious decline in their ability to use Russian can be explained by political factors, marriage between Russians 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heir views on language.

Keywords: Russian ethnic group; Inner Mongolia; mother tongue; decline; factor

Author: Bai Ping, Prof. of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linguistics and Russian linguistics. Email: <verabp@163.com>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俄罗斯族语言研究——以新疆、内蒙俄罗斯语田野调查材料为依据”（编号：11BYY100）阶段性成果。

俄罗斯族是中国 30 余个跨境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15393 人（2010 年），其中新疆有 8489 人，占 55.15%，内蒙古有 4673 人，占 30.36%。

内蒙古的俄罗斯族多为十月革命前后迁居至此的俄罗斯移民与中国汉族结合的后代，以位于大兴安岭西北山麓的额尔古纳市为主要聚居地。近百年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之长期与汉族通婚，和汉族交错居住，内蒙古俄罗斯族的母语——俄语的使用呈明显衰退趋势。

一、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现状

调查显示，额尔古纳俄罗斯族使用的基本语言是汉语和俄语，其中汉语普遍为俄罗斯族掌握，共同交际语和家庭用语均为汉语，俄语因使用者年龄的差异，掌握程度也不尽相同，但会读、写俄语者甚少。

70 岁以上的老人一般能讲流利的俄语，其汉语一般是在十几岁之后习得，因此很多人的俄语较汉语要熟练。这个年龄段的俄罗斯族老人彼此交往时多使用俄语，但与家人或同村的年轻人交往时则一律使用汉语。

四五十岁到六十多岁的中老年人群，大多在幼年跟父母或长辈习得了俄语，加之那时周围人都讲俄语，只是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被迫脱离了俄语环境，所以这个年龄段的许多人仍可以讲少量俄语。四五十岁的人多半能听懂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话语，会说一些日常用语或词语。个别六十开外的人，口语表达相对流利一些，但较之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有明显退化。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与老年人交往时，无论对方使用何种语言，他们通常都用汉语作答；与年轻人及彼此之间交往时，只使用汉语。

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及儿童，掌握的语言基本上只有汉语一种，为数不多的人可以听懂生活中常用的个别俄语单词。二十岁以下的人，俄语水平较其父辈还要差。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相互之间及与长辈之间交往时均使用汉语。

我们在俄罗斯族人口最密集的临江屯进行了“俄语掌握情况”的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45 份，其中 70 岁以上 9 人，占样本

总量 20%；60-69 岁 4 人，占 8.89%；40-59 岁 15 人，占 33.33%；20-39 岁 11 人，占 24.44%；20 岁以下 6 人，占 13.33%。调查结果见下表：

“俄语掌握情况”调查

		年龄段				
		20 岁以下	20-39 岁	40-59 岁	60-69 岁	70 岁以上
听说能力		6 人	11 人	15 人	4 人	9 人
听	完全能听懂	0	0	1	3	8
	大部分能听懂	0	2	6	0	1
	听懂个别单词	3	8	7	1	0
	完全听不懂	3	1	1	0	0
说	能流利表达	0	0	0	3	8
	基本能表达	0	2	1	0	1
	表达有困难	1	5	8	1	0
	完全不会说	5	4	6	0	0

结果显示，7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有 8 人能完全听懂和流利表达，占总人数 90%；60-69 岁年龄段能完全听懂并流利表达的有 3 人，占 75%；40-59 岁年龄段完全能听懂的只有 1 人，占 6.67%；其他年龄段能完全听懂和流利表达的人一个也没有。

这些数据表明，当地俄罗斯族的母语能力呈明显衰弱趋势，年龄越轻，俄语掌握程度越差，使用人数越少，使用现状不容乐观。

二、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衰退成因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母语衰退并非短时间、单方面的原因所致，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政治因素的影响

索绪尔说：“有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对于许多语言事实有无可估量的影响。”^① 对额尔古纳的俄罗斯族来说，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起大事件，对其语言的使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其一是苏联侨民的回迁。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为战后重建，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曾于1947年8月至翌年初从中国集体遣返了一批居住在沿海大城市的侨民。上世纪50年代中，在轰轰烈烈的大垦荒运动中，劳动力问题再次成为困扰苏联政府的头等大事。中苏两国政府经多次磋商，于1954年-1955年对侨居中国的俄罗斯移民再次进行了集体遣返。

俄罗斯移民从中国的大批迁离，也使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人的数量锐减。到1964年，额尔古纳右旗的俄罗斯移民只剩下1户5人，^② 和建国初期的1825户、9799人^③ 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情况显然会对当地的语言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操俄语者人数的减少，俄语的使用范围和交际功能大大缩小，一度成为当地强势语的俄语的地位随之发生动摇。

其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俄语成为禁语，被迫在家庭和族内交际中消失，这使得“文革”期间出生的人失去了自然习得母语的可能。而那时已掌握俄语的青少年，“文革”后由于脱离母语的时间过久，已经忘记大半，俄语水平自然受到很大影响。从我们在当地的调查情况看，“文革”期间及之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不懂俄语。这种明显的“断档”现象，应该说与“文革”的影响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2. 通婚的影响

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与汉族通婚比例的逐代增多，是导致额尔

① [瑞士] 索绪尔（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3页。

②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666-667页。

③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现状的又一重要因素。

现今 70 岁以上的俄罗斯族老人，一般属于第一代的华俄后裔，他们的父亲多为中国山东、河北等地的汉族，母亲为俄罗斯人。家庭组合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家庭用语通常为俄、汉两种语言，且多以母亲所讲的俄语为主。因此，第一代华俄后裔从小便在家庭中习得了俄语，有些人还同时习得了汉语。当时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移民众多，村里又有俄罗斯人开办的俄语学校，俄语自然成为了当时的优势语。

第一代华俄后裔的配偶大多也是中俄混血人，也有为数不多的人选择汉族作配偶。这种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用语的新模式，即：夫妻双方均为华俄后裔的家庭，家庭内部用语通常为俄、汉两种语言，并以其中一种为家庭主要用语；华俄后裔与汉族人结合而成的家庭，家庭用语往往为汉语。这时村屯中人们之间的共同交际语一般也是俄、汉两种语言。

第二代华俄后裔中的年长者，其配偶情况与第一代华俄后裔相似。但年龄稍轻的人，婚配嫁娶的情况则与其父辈有很大不同。“文革”期间，由于心灵上所遭受的创伤和心理上对本民族的不认同，华俄后裔的审美和择偶标准产生了根本变化。为了不让自己的后代继承欧罗巴人种的“丑陋”外表而遭人讥笑和歧视，许多华俄后裔开始选择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人为配偶。汉族人绝大多数不会俄语，因此，汉语便成为这种新型家庭中各成员交流的唯一工具。

第三代华俄后裔从小在汉语环境中长大，几乎没有接触过俄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掌握汉语一种语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四代、第五代的华俄后裔。

我们在额尔古纳市室韦镇俄罗斯民族乡下辖的恩和、临江两地做了“俄罗斯族配偶民族成分”的调查。调查数据显示，俄罗斯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在 70 岁以上年龄组非常少，在 50-69 岁年龄组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在 30-49 岁年龄组则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很显然，俄罗斯族与其它民族，尤其是与汉族通婚的比例随人群年龄的年轻化而呈显著上升趋势，这无疑会对俄罗斯族及其后代的母语使用产生重要影响。见下表：

“俄罗斯族配偶民族成分”调查

恩 和 (43 人)				临 江 (39 人)			
年龄段	配偶民族			年龄段	配偶民族		
	中俄混血	汉族	其他民族		中俄混血	汉族	其他民族
70 岁以上 (8 人)	8	0	0	70 岁以上 (9 人)	8	1	0
50-69 (19 人)	18	1	0	50-69 (15 人)	8	7	0
30-49 (16 人)	8	6	2	30-49 (15 人)	2	11	2

3. 传播渠道的影响

“文革”以前，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家庭用语多为俄语。“文革”期间，由于俄语被禁止使用，其家庭用语被迫改为汉语。“文革”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共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俄语不再是禁语，但除老年人外，能讲俄语者数量很少。对年轻人而言，无论家中有没有懂俄语的老人，他们接触母语的渠道只局限于村中老人们的彼此交谈，时间、内容都很有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俄罗斯族人，尤其是俄罗斯族年轻人和儿童对俄语的习得。

此外，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的缺失，也是导致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状况的重要因素。

20 世纪 50 年代中，在大批俄罗斯移民迁离后，他们兴办的俄语学校也随之停办。1994 年，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成立，其建设内容之一便是在学校开设母语课程。当时，民族乡下辖的牧场中学和恩和小学都曾开设过俄语课程，但几年后便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停办，至今没有恢复。俄罗斯族的孩子彻底失去了从学校途径获取母语知识的可能。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生活的地区与俄罗斯虽仅一河之隔，但却在彼此接触和信息往来上存在着天然障碍。自俄罗斯移民迁离后，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地俄罗斯族基本没有可能与境外俄罗斯人接触，也不具备收听俄语广播，收看俄语电视的条件。再加上当地

懂俄语的俄罗斯族老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因此也不可能阅读俄文报刊书籍，即便能够阅读，获得俄语文字资料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所有这些，无疑会限制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的传播和使用。

4. 语言观念的影响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语言观念的变化，是和他们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文革”时的遭遇，使俄罗斯族人对自己母语的情感产生了变化，惧怕说俄语会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厄运。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俄边境贸易升温，俄语的作用日渐显露。在与境外俄罗斯人的接触中，许多人已然生疏的母语又慢慢恢复起来。但时隔不久，随着中俄边贸的降温和俄罗斯经济的滑坡，俄语再度成为被冷落的语言。

俄语使用的反反复复以及自身命运的起起伏伏，使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认识到，只有熟练掌握汉语，才是保证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必备条件。我们在当地调查时，在问卷中设计了“对孩子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是什么”。133 名被调查人中，有 102 人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结果显示，认为“对孩子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是汉语的有 66 人，占到 64.71%；是俄语的有 25 人，仅占 24.51%。见下表：

“对孩子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调查（102 人）

语种	汉语	俄语	英语
人数	66	25	11
百分比	64.71%	24.51%	10.78%

从问卷结果看，大多数俄罗斯族人对汉语的认可程度要远远高于俄语，这一方面说明，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和当地优势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额尔古纳俄罗斯族对掌握本族语所具有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这种语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族人，尤其是俄罗斯族年轻人学习俄语的热情。

三、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衰退的启示

1. 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衰退的一种特殊类型

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满族基本转用了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居住状况、人口比例、通婚情况、母语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民族汉语和本族语并用，有的以汉语或本族语为主，还有的除汉语和本族语外，还使用本地区主要少数民族的语言。

从整体上看，汉语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掌握的语言之一，而各少数民族的本族语都存在程度不等的退化现象，有些民族的本族语退化现象甚至十分严重，达到了濒危的程度，如赫哲语、仙岛语、仡佬语、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土家语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与民族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因素有关，更与汉语作为全民通用语的地位日益提高密切相连。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汉语在民族交流和对外沟通方面的优势日益突出。在和汉语的频繁接触中，少数民族语由于使用人口少，难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中的年轻人，会更多地使用汉语。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转用汉语通常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双重语言制过程，即要经历民族语——汉语双语并用的缓慢过渡。随着汉语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本族语的地位逐渐萎缩，直至最后停止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民族语言的使用不致中断。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相比，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母语衰退具有速度快、范围广、缺少过渡等特点，属于中国民族语言衰退的一种特殊类型。虽然俄汉通婚、人口构成、传播渠道、语言观念等因素也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却不足以导致当地俄语在短时间内的急剧衰退。能够对一种语言的使用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唯有政治因素。

政治对语言的影响有时带有强制的性质，它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运用自身权利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可以影响语言的传达手

段和表达方式，左右语言的地位和使用者的语言态度，甚至决定语言的兴亡。古今中外，因政治原因导致的语言兴衰并不鲜见：鲜卑语的灭绝，西夏语消失；希伯来语的死而复生，英语和法语数百年来的一消一长，无不与政治的影响息息相关。

然而在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因政治原因导致的语言衰退似乎只发生在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身上。中苏关系的破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些有着特殊血统的人群在审美标准、择偶需求、母语态度、语言使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对当地俄语教育的外在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

应该说，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上的变化，是由政治因素直接导致并诱发，属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功能衰退的典型个案。

2. 是中国跨境语言的一种特殊类型

跨境语言是分布在领土相邻的不同国度的同一语言。中国有 30 种跨境语言，其使用情况和所处境遇多有不同。通常，跨境民族的人口数量、居住状况、有无文字、受教育程度、母语传播渠道是否畅通、国家和政府的扶持力度等，都会对其母语保持有一定影响。

中国朝鲜族和蒙古族由于人口较多（朝鲜族有 190 多万人，蒙古族有 500 多万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因此母语保持较好。朝鲜族早在 1949 年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民族大学——延边民族大学（今延边大学），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及广播电视，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蒙古族除拥有自己的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出版社及蒙古语文研究机构外，内蒙有关高校、研究所还收藏有上万册蒙古文古籍，且一些蒙古族中小学及大专院校都用蒙古语授课。而中国赫哲族人口不足五千人，没有本族文字，居住地区学校数量极少，且只使用汉语汉文教学。目前赫哲族母语退化明显，已达到濒危程度。京族人口两万余人，没有文字，大多已转用汉语。

作为中国唯一一种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语，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其他的跨境语言。

首先，额尔古纳俄语母语人与境外俄罗斯族既血脉相连，又有所区别。血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作为边缘群体的特殊处境和尴尬地位，也使其所用语言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敏感性。

其次，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虽然人口不多，却有自己的语言和文

字，但母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各年龄段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母语文盲。

第三，额尔古纳俄罗斯族使用俄语者多为高龄老人，但在境外却拥有强大的语言后盾。目前世界上有超过 1.7 亿的人使用俄语，除俄罗斯外，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多以俄语为国语。

第四，与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血统相关的两个国家关系特殊。中苏两国曾有 7600 多公里的边界线，中俄边境线也长达 4350 多公里。两国同属可以左右世界局势的大国，且两国之间的关系足以影响全球政治气候的发展变化。

上述几点决定了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的独特性，也使其呈现出与其他跨境语言不同的使用状态。

国家版图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跨境语言的命运究竟受制于母语人所在国度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多，还是受背后强大母语阵营的影响更大，抑或是更易受国界和两国关系的左右？这些都是跨境语言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瑞士] 索绪尔 (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
2.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 年。
3. 姚喜明、王胜利：〈论政治对语言演变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4.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上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
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
6. 何俊芳：〈赫哲族语言丢失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

亚洲对帝国主义的回应： 孙中山和马哈迪反帝国主义论述比较分析

陈中和

内容摘要：19 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形成重大的冲击，他们透过殖民化、侵略、压制和剥夺来取得对亚洲诸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地位，他们甚至也重划了亚洲诸国的领土，重组了亚洲的社会结构。虽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以及各项科技和现代产品，协助催化了此区域的现代化发展，帝国主义的扩张也为亚洲各地带来了民族的觉醒，以抗拒白人和西方至上的支配霸权，自 20 世纪初期至中期亚洲各地遂兴起了一故民族自决，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作为团结国家的理想，一些著名的亚洲领袖发展出一套反帝国主义的论述以合理化他们的发展愿景和政策路线，这些论述经常结合在地的价值、文化和理念。

本文透过整理他们各自的反帝国主义论述以及国家发展的理论，来比较和分析两位亚洲著名的国家领袖，现代中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医生和马来西亚任职最久的首相马哈迪医生的亚洲观点，从中审思亚洲独特的国家发展途径。研究显示孙中山和马哈迪皆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皆以反帝国主义的论述为其治国理念构成的主要部份，他们皆相信西方帝国主义是国家的主要外在威胁，因此他们在国家发展上皆积极倡导非西方的价值，如孙中山积极推动中国的传统价值，马哈迪则强调马来价值和伊斯兰的理念。然而，孙中山的最终目标是塑造一个不分族群和宗教皆为平等的民主国家，反之，终其任期，马哈迪经常用反帝国主义为借口来合理化其对国家进行威权统治，研究也显示在国族整合的态度上，孙中山倾向于把所有族群整合成一个民族，马哈迪则倾向在马来支配权和伊斯兰的领导权之下，透过各族群权力分享和协商的方式来整合国内的族群，这两种不同的国族整合观点分别在两个国家发展成不同的国家政策，并对它们各自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孙中山; 马哈迪; 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 陈中和博士,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兼中文系系主任及中华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组组长。主要研究方向: 孙中山与中国当代政治思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马来西亚族群研究、马来西亚伊斯兰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邮箱: chincf@utar.edu.my

Title: Asian's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r Sun Yat Sen's and Dr Mahathir Mohamad's Anti-Imperialism Discourses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enturies, Western imperialism has inflicted tremendous upheaval to the countries in Asia. Through colonization, invasion,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West has usurped the Asian countr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ey even reconfigured the boundaries and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Asian countries. Although Western ideas and system as well as modern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were introduced and help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egions, imperialism has also caused an awakening of the Asian people, to rise and oppose white and Western supremacy. From the early to mid 20th century, a wave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anti-imperialism movements swept across the Asian regions. Using this sentiment as a rallying point, some prominent Asian political leaders began to formulate anti-imperialism discourses to rationalize their developmental and policies program. These formulations often incorporate distinct local cultural ideas and values.

This article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China, Dr Sun Yat Sen's and longest served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bin Mohamad's, discourse on anti-imperialism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rogram for nation-building. The aim is to decipher the two leaders' contribution to a distinctly Asian wa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Dr Sun Yat Sen and Mahathir Mohamad are strong advocates of nationalism, with anti-imperialism being a key factor in the shaping of their political ideology. Both leaders firmly believe that Western imperialism is the major external threat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for that reason their emphasis on national developments were steered towards non-Western models and values. For example, Dr Sun champion for the reaffi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eritages while Dr Mahathir focuses on elevating the Malay culture and the Islamic ideas.

However, Dr Sun ultimate aims to form a democracy where there is equality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or religions. On contrary, throughout this tenure as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used anti-imperialism as an excuse to consolidate his authoritarian rule. This article also found that in term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Dr Sun's policy is to assimilate all the ethnic groups into a single nation. Dr Mahathir however prefers to adopt a moderate integration through power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alay supremacy and Islamic hegemony. Thus fa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tatesmen's ideas have contributed to two divergent path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with huge impact o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Keywords: Sun Yat Sen; Mahathir Mohamad; imperialism

Author: Dr Chin Chong Foh, Assistant Professor, head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nd head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Unit, University of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political science, Dr Sun Yat Sen's and Modern China political thought,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Malaysian ethnic studies, Malaysian Islamic studies, and cross cultural studies. Email: <chincf@utar.edu.my>

前 言

辛亥革命创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作为近代亚洲民主化的先锋，中华民国第一位总统孙中山（1866-1925）留下了大量超越同时代中国人，以救国济民为根本，历百年而不朽的政经思想。纵观这些标榜以三民主义为首的政治理论，孙中山所鼓吹的救国途径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将西方当代的政治理论和中国社会传统加以融合，并不断透过实践来加以完善之，从而打造一个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使之作为其他亚洲国家的楷模，以拯救亚洲国家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对此，孙中山堪称亚洲第一个建立反帝国主义论述，并积极提倡亚洲观点或亚洲价值的国家领袖。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平民出生的首相马哈迪（1925- ），他除了拥有和孙中山同样的医生背景之外，也和孙中山一样，是属于一位积极追求救国济民之路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位期间也以反对西方

霸权，提倡亚洲观点而成为国际知名的领袖。论反帝国主义话语之多元，国家发展理论之丰富，马来西亚历任首相没有人能出马哈迪之右。他也同样地将西方政治理想加以修订转换为适合马来西亚国情的政治体制，并义正词严地加以捍卫之。

本文首先叙述帝国主义的本质，就两位名闻亚洲的国家领袖，孙中山医生和马哈迪医生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内容和相关的响应之道，以及他们独特的治国观点作一分析比较，从中审思亚洲开发中国家的发展途径，以及西方政经制度在新兴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一、帝国主义及其论述

一般而言，帝国主义（imperialism）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对其他国家或群体的主宰关系”，^①或以 E.M. Winslow（1948）的说法，帝国主义是一种“单方面地强制约弱，自由制约奴役的控制关系”，它的好战特性也使它成为军事主义（militarism）的同义词。^②进一步来说，以 Barbara Bush（2006）所言，帝国主义的扩张就是对殖民地区的剥夺，这种剥夺的方式可透过进贡、赋税、土地征收、对贸易或生产的控制来加以进行，^③“从过去的罗马帝国到今天的美国军事强权，军事和科技的主宰性是维系帝国权力不可或缺的要素。”^④

John A. Hobson（1902）在他的不朽名著《帝国主义：一个研究》中就指出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帝国主义就是指对外领土统治权的取得和对外人民的移殖，因此它也可称为殖民主义（colonialism），但欧洲帝国在 19 世纪中叶所进行的计划性领土扩张政策，却和过去的殖民主义有所不同，首先，这些领土的取

① Iain Mclea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36-37.

② E.M. Winslow,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Theories of Power*, New York: Octagon Book, 1972, p. 3.

③ 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6, p. 25.

④ *Ibid.*, p. 30.

得方式多元化，它们或以“被保护国”（protectorates）的名义，或以公司条约的方式来加以获取，而非母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其次，这些被占领的地区多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并不适合白人的移殖，当地也遍布“下等民族”（lower races）^①，并不适合将母国的西方文明力量（Western civilized power）如政治权利和市民自由引入，因此这个时期的领土扩张是一种独裁专断统治的扩张，和加拿大、澳洲、南非等的殖民方式迥异，其三，它们的占领是透过极少数的白人官僚、贸易商、工业领袖对极大量被视为低等、无能力进行政治和经济自我管理的人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上支配。^② Hobson 认为，这种非直接占领的扩张政策，主要是由取得技术进步，拥有大量生产能力的极少数欧洲工业领袖（captains of industry）所推动，他们虽透过不断的并购而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彼此之间却是割喉式的竞争（cut-throat competition），基于投机和快速获利的心态，他们企图征服世界各地，除了为了掠夺当地丰富的资源外，也是旨在寻求新的市场以大规模倾销他们的产品，而这种型态的领土扩张政策，就是“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③

同理，E.M. Winslow 也指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追求利润极大化思维下，被殖民国（按：Winslow 认为这些被殖民国不管它是被保护国的名义还是以直接管辖的名义来支配，事实上它们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一切皆是母国的财产，并尽可能对它的土地加以剥削（to be exploited to the fullest extent）。^④ 而 19 世纪欧洲诸国彼此之间实施过高的关税壁垒，也促使这些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积极寻求额外的市场来倾销商品。^⑤ 1916 年的列宁（1870-1924）也认为帝国主义不全然是领土兼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

① 值得注意的是，John A. Hodson 是以括号来说明 lower races 这个专有名词，显见这虽是当时流行的词汇，其内容却充满争议性。见 John A. Hodson, *Imperialism, A Study*, New York: James Pott and Co, 1902, in,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obson/1902/imperialism/pt1ch1.htm>, 上网阅览日期：2015 年 9 月 23 日。

② Ibid.

③ Ibid.

④ Winslow,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Theories of Power*, p. 15.

⑤ Ibid., p. 34.

生产和资本独占化的结果。他指出资本主义下市场自由竞争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大企业并吞小企业，而最终导致生产和资本的独占化。资本家利用控制各国市场的手段来累积财富，致使世界版图将会由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强权所分割把持。因此，帝国主义最深层的经济根源就是资本家对生产和资本独占的需求，^① 即为极少数的富裕国家对大多数弱而小的国家的主宰关系，这些独占的资本家只坐享他国人民劳动的成果，是一种“寄生，衰退的资本主义”（*parasitic, decaying capitalism*），^② 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其走向毁灭的最后阶段。是以，在列宁的鼓动下，“反抗帝国主义”成为列宁式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求，^③ 它作为左派团体发动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影响了许多共产国家如中国、东欧诸国等好几个世代的人民。^④

虽然如此，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带来了正面的效果。Bill Warren 辩称，帝国主义是西欧对其他国家传播技术、文化、和体制的方式，这些复兴、改革、启蒙和工业革命的文化给世界各地带来了革命的种子，提升了各地的人文价值，^⑤ 在殖民统治期间，也有许多非洲和印度的知识分子“狂热地”（*enthusiastically*）欢迎帝国主义以改革他们的旧文明。^⑥ 同理，E.M. Winslow 也认可西

① V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London: Junius Publications Ltd, 1996, p. 101.

② *Ibid.*, p. 104.

③ 必须要注意的是，虽然战后主要的共产党国家都以“反帝国主义”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轴，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留下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左派的反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是由列宁、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等共产主义信徒所催生的，由此也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的主体内容，它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是有所区别的。相关数据可参考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8-135.

④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描述，大体符合当时的状况，惟他无法预见西方普遍选举的民主制度迫使政府重视并提高工人的福利，成功舒缓了劳动阶层的民怨，加上教育的普及活络了阶级间的流动等的环境因素，使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自我修正其各种弊病，并大大地延缓了其毁灭的期限。目前看起来虽然投机、贪婪至上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因间歇性的金融风暴而持续遭受重大的打击，许多国家的经济也蒙受重创甚至濒临破产，但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离列宁所说的自我毁灭阶段，仍然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⑤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LB, 1980, p. 136.

⑥ *Ibid.*, p. 137.

方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给殖民地带来很大的冲击，惟这些西方的价值却反而成为当地反抗帝国主义的利器。^①

E.M. Winslow 认为帝国的思想，乃以文明的本邦人和野蛮的外邦人来加以区分，不管善意抑或是恶意，皆视外邦人为次等人，或奴隶，并以这种心理来规范和指导他们的行为。^② 在这种思维下，1899 年著名文豪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甚至以“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为题创作了一首诗来歌颂帝国主义改革他国文明，“为他人谋取福利”的努力。^③ 于是乎，欧洲诸邦的帝国主义带来的不止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全球的主宰，还包括了在族群上和价值上的支配。对此，Barbara Bush 主张帝国的信仰就在于相信其所代表的民族和文明远较其他民族或文明优越，因此其他的民族必须在帝国的统治秩序中属于永久的从属地位，^④ 是以，“帝国主义所建构的是欧洲中心（Eurocentric）的世界，而所谓的现代化就是指文明的西方对抗落后的其他文明的过程”，^⑤ 当代全球的政经秩序就是以这个欧洲的现代化观点来加以建构，并持续主宰着全球的命运。

不可否认地，帝国主义的扩张也为全球各个殖民地或属地带来了民族的觉醒，帝国主义让殖民地人民成为集体属民，无形中制造了一种殖民和被殖民、权力者和无权力者的二元冲突，^⑥ 白人民族主义的统治也激起了当地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教育的普及和行政制度的深化也加速了民族思想的传播，因此如 A.P. Thornton 所言，不难发现殖民地所有追求建国的民族主义菁英领袖都是受殖民者教育的熏陶，或属于殖民统治机构的一员，他们所要争取的，不单是民族的独立自主，而是民族的尊严，即能和殖民者拥有平等能力以及平等地位的尊严。^⑦ 于是乎，20 世纪殖民国家的民族主

① Winslow,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Theories of Power*, p. 13.

② Ibid., p. 7.

③ 这乃是引用他的诗的一段：“To seek another's profit, and work another's gain”。

④ 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p. 27.

⑤ Ibid., p. 96.

⑥ Ibid., p. 37.

⑦ 上文的论述乃是综合 A.P. Thornton 的观点而来。见 A.P. Thornton,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义运动多以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号召，即使在非殖民地国家的中国，亦不例外。^①

综合以上的论述，可见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不是过去式，而是一种现在进行式的压迫行为，而反对帝国主义，提倡本土价值就是近代和现代亚洲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就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孙中山，以及世界知名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马哈迪对欧美帝国主义的理解作一诠释，并对其响应之道作一初步的比较探讨，以发掘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共通性和必然性，并从中检视民族主义运动的出路。

二、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理解

孙中山对中国最大的贡献，除了是鼓吹和领导终结二千年的中国帝制传统之外，就是在他身后留下了深受中国海峡两岸肯定的理论和主张，除了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和体制乃依据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而打造之外，^② 史家杨天石也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继承者。^③ 他之不朽，在于“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与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④ 他“融

1978, pp. 145-185.

- ① 事实上，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主要并不是立基于阶级斗争，而是民族主义，列宁巧妙地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结合在一起，使许多共产党菁英如毛泽东等因为胜利而无法看清阶级斗争为虚，民族斗争为实的本质，而导致许多无谓的阶级迫害，损失了大量的菁英人口，也降低了国家的生产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柬埔寨波布政权的大屠杀。于是乎，国外的资本主义帝国尚未自我毁灭，国内的共产党就以过激的阶级斗争来毁灭自己，凡此种种，实在是共产党革命的一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导致共产党国家在上个世纪末民生凋零，并纷纷灭亡。所幸中国在邓小平上台后，扬弃毛泽东时代强调阶级斗争的治国观，回归孙中山以民族为本的立国方针，方才得以重新壮大起来。
- ② 见《中华民国宪法》第1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 ③ 杨天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初政局》，台北：风云时代，2009年，第45-73页。
- ④ 贺凌虚：《孙中山政治思想论集》，台北：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

合古今中外成果于一身，以高瞻远瞩、吞吐万象、富于创新的雄迈气势，创立理论，规划未来，以理论指导实践，将理论付诸实践，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只有孙一人能够做到，这也是他得以超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伟大之处。”^① 因此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孙中山可以称作是提出完备的开放思想与政策的第一人。”^②

纵观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程，其革命的观点历经了大幅的更动，总的来说，依学者朱浚源、王晓波等的观察，孙中山立国思想之发展，是先由排他性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汉民族主义”为起始，再因应时势，才逐步增修补述，在民国建立后始发展成为融合多元的国族主义，并最终演化成追求世界民族平等的“大亚洲主义”。^③

不可否认地，孙中山从1895年10月图谋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事败之后，就开始在世界各地积极诉诸汉人的民族情绪，宣扬排斥满族的汉人民族主义，以推翻满清政府，如1904年4月10日孙中山在旧金山的华人会党洪门的大会上，在其写下的新章程就提出“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④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也以同样的口号作为同盟会的四大纲领，从此该“驱除鞑虏”的口号就传遍海内外，成为革命党人的共同誓言，使孙中山一跃而成为汉人民族主义者的领袖。

惟我们审思孙中山的主张，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最早，也最一以贯之的政治要求，并非推翻满民族的民族革命，而是追求强盛中国，抵御外国侵略之道。对此，台湾学者庄政认为孙中山早期外交思想的本质和主流，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国完全独

1995年，第1-2页。

① 曾纪鑫：〈孙中山：民国之父〉，曾纪鑫：《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台北：远流，2009年，第365-410页。

② 杨天石：〈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初政局》，2009，第92-104页。

③ “狭隘的民族主义”一说来自朱浚源（1992），“汉民族主义”一说可见：王晓波编著：《孙中山思想研究》，台北：问津堂，第46页。

④ 孙中山：〈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1904年5月24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九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239-249页。

立，而且是一以贯之的。^①

孙中山早年生长在广州，由于 14 岁至 18 岁（1879-1883）期间在夏威夷留学，生活在白人与夏威夷人排华的恶劣环境中，自然深切体会到种族与国家被欺凌的耻辱。^② 我们从孙中山 1894 年 6 月上李鸿章（1823-1901）书的内文中所看到的也是一个怀着满腔热血，准备报效满清朝廷的爱国青年，在书中他首次揭示资本主义帝国的成功之钥：“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③ 然而在李鸿章未能接见孙中山，复又在次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而割让台湾之下，孙中山才对满清政府绝望，始发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为志愿。

由此可见早年孙中山所追求的是拯救中国之法，而非排满之道。即使上书李鸿章未获回应后，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时，仍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申民志，扶国宗”为宗旨，^④ 自 1895 年 2 月 18 日他回香港组织兴中会，才有对朝廷和官府公开的猛烈批评，但所批评之焦点，乃是针对官府和朝廷的贪污腐败，纲维败坏，成立兴中会的宣言里有一段“庶我子子孙，免于奴隶于他族”，当中所谓的“他族”其实是指“久垂涎我中华五金

① 对此，庄政认为，中共领袖长期认为孙中山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基于此阶级成分的软弱性，在革命之初未尝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而且在他一生的大部份时间中，都存在着以为帝国主义国家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的幻想，直到他的晚年，才彻底醒悟过来，这种说法，不符事实。见庄政：《孙文思想与政略》，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 年，第 68-69 页。

② 对此，孙中山曾提到，早年中国人坐船到美国，无论所坐的船位是哪一等，美国人都会来盘问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如果是日本人，便可自由上岸，如果是中国人，便要入关检查，而且要麻烦好几日，而且旧金山的大旅馆，也不许中国人住。见孙中山：〈国民以人格救中国〉，1923 年 10 月 21 日在广州青年联合会的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 353-360 页。

③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 年），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四册，第 9 页。

④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1894 年 11 月 24 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 1-2 页。

之富，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环列强邻”，而非国内统治族群之压迫。^①可见在未发动暴力革命之前，孙中山早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所认识，在1895年底开始发动暴力革命后，他也时时不忘提醒世人帝国主义的危害，如1904年5月他就强调：“当今为竞争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唱帝国主义，莫不以开辟疆土为野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和清国而已。”^②

因此孙中山鼓吹推翻满清政府，表面上是号召汉族驱逐异族统治，实际上却是防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如1907年孙中山在马来亚槟城对华侨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已是处于极危险的地位，随时可以遭外国瓜分的惨祸”，满清政府对列强予取予求，成为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的奴隶，而汉人又是满人的奴隶，就成为“奴隶中的奴隶”，因此，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首先就要推翻满清政府。^③在槟城的另一场演讲中，孙中山也认为“列强既鉴于满虏的积弱，与其惧外媚外的心理，为求进一步的施行侵略起见，于是更划定势力范围于各省，充其极必瓜分中国而后止”，因此要“驱逐满州的鞑虏，挽回已失的主权，建设独立的基础，才可救中国。”

我们深究孙中山早期排满的激烈言论，主要目的就是团结大多数的汉族以推翻满清政府，免除“亡国灭种”的威胁，^④因为“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我华人今日乃亡国之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⑤而满清政府把“祖宗留下来的土地送归外国的版图，把四万万炎黄裔胄，沦为他人的奴隶”，^⑥若不革命，“中国势必由满清之手，转而亡于外

① 孙中山：〈香港兴中会宣言〉（1895年2月18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2-5页。

② 孙中山：〈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190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九册，第239-249页。

③ 孙中山：〈欲救中国必先推倒满清〉，1907年槟榔屿平章会馆演说，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4-16页。

④ 同前注。

⑤ 孙中山：〈中国革命之难易〉，1910年2月28日在旧金山丽蝉戏院对华侨演讲大意，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8-19页。

⑥ 孙中山：〈满清不倒中国势必再亡〉，1908年槟榔屿小兰亭俱乐部演说，

人，到时亡国奴生活之惨痛，或更有十百倍于今日”。^① 因此，在孙中山的眼中，所谓的大清帝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而已，必须要加以推翻之。

孙中山采取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实在是为合理化其暴力行径的不得不然。对此，西方学者 Daniel Chirot 和 Clark McCauley 分析，迫在眉睫的威胁论其实是强化族群团结最有效的手段，而且也容易为立场极端的领袖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这一类的领导者能够动员人们追随，是藉强调威胁之严重，使之产生一种恐惧，而力量最大的恐惧，就是对灭亡的恐惧，恐怕“我们的人”，“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会无法存活，这种恐惧除了会巩固群众的认同之外，亦会引起最激烈最极端的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坚强的群体认同，个人会不甘愿为团体牺牲自己的性命。^②

而对于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史学家唐德刚还是给予高度赞扬的，他认为这个口号主题鲜明，而且把大清帝国之内的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这个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③ 于是乎，自孙中山提出排满的革命论后，海外侨社特别是马来亚新加坡一带掀起了一股革命的民族意识，革命派的影响力后来居上远远超过保皇派，^④ 两地的华侨也对孙中山所发动的最后几次革命中提供最大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学者华中兴认为，现实的急迫感使孙中山要寻求一种简化的救国之术，而最简化的方式即是以分化的手法推翻拥有多数汉人维持却由满人作皇帝的清朝。^⑤

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 16-18 页。

① 同前注。

② Daniel Chirot & Clark McCauley 著，薛绚译：《为什么不杀光：政治大屠杀的秘思》（*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台北：立绪，2007，第 95-99 页。

③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台北：远流，1998，第 134 页。

④ 此乃根据郑良树的观察。见郑良树：〈保皇党及革命党对新马华教的影响比较〉，张希哲与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第 63-81 页。

⑤ 华中兴：〈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本源初探：种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思与言》，1992 年 30 卷第 2 期，第 39-90 页。

因此，一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我们就不难发现身为总统的孙中山就立即扬弃旧说，开始积极主张汉、满、蒙、回、藏的民族统一，五族共和了，^①而此后，排满的主张不再出现于他的言论之中。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点在建国前后改变如此迅速，甚至自我否定，就可证明在革命时期所宣传的排他、偏狭的汉族种族主义，并非孙中山真正的主张，因此，孙中山所提倡的革命思想，由始至终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一旦革命成功，孙中山就把民族主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

在1912年辞去了大总统的职位后至1924年逝世的这段期间，孙中山又历经了多次的政治波澜，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以及他对帝国主义的诠释，也发展的更为成熟与透彻。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分成三个层面，其一为政治力的压迫，其二为经济力的压迫，其三为精神或价值上的压迫。

首先，孙中山看穿了“欧洲各国是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的本质，^②主张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世间的战争，主要就是帝国主义为侵占他国的资源所发动，^③然而，如果他国不能在政治上屈服弱国，就会对其施以经济上的压迫：“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是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④而这种经济上的压迫，依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所言，至少有七种模式：

-
- ① 见“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日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日领土之统一。”见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912年1月1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十一册，第23-25页。
-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3-12页。
- ③ 见：“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即中国所谓勤远略。这种侵略政策现在名为帝国主义。欧洲各民族都染了这种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几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战，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战。”见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9-37页。
- ④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1. 倾销商品：孙中山以西方大量纺织品进入中国销售而打垮中国纺织工业为例子，举出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压迫，首先就是大规模地倾销西方廉价的工业产品，使一国的民族经济完全倾覆。^①
2. 高额赋税：西方各国控制下高额的海关税务，使中国货物无法正常销售。
3. 外国的银行和汇兑：外国银行收取中国人的黄金等存款累积资本，又透过放款的方式，赚取中国人的利息，尤其甚者，更专门印刷大量纸钞，换取中国人的货物，“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都是用纸钱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许多钱，好像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②“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统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③
4. 运输的费用：中国由于没有自营的国际运输公司，所有商品的出口都要仰赖外国海运，甚至在国内的运输也受外国公司所控制，中国产品的成本有很大一部份属于外国公司的运输。
5. 地租和地价：租界内的外国人任意买卖中国土地，中国人缴交给外国人的地税和租税，不计其数。
6. 独占的经济之权：中国境内外人之团体及个人营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中国之利权。
7. 投机事业：“租界以内的外国人，每利用中国人贪婪的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有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的赌性熟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结果，总是中国人受亏累，这种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的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数目了。”^④

纵观以上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压迫，没有一项是过时的，它们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② 同前注。

③ 同前注。

④ 同前注。

至今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或企业对开发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以至巧取豪夺的主要手段，足可见孙中山当年的真知灼见。孙中山主张这种经济的压迫，和政治的压迫是相辅相成的，即“他们的政治力帮助经济力，好比左手帮助右手一样，把多数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民，压迫得很利害。”^①

孙中山断言，经济力的压迫，比政治力更为可怕，因为“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是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是无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见。”^② 帝国主义“将中国做成他的商场，源源不绝的销售他的商品，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土地出产及人民的劳力，来满足他们掠夺原料，榨取劳力的欲望。这样绝人生计灭人种族的政策，在美、非、澳诸洲都是百发百中的，不怕中国会逃到哪里去。”^③ “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的压迫是很利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是更利害。”^④

除此之外，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所实施的，还有精神和价值上的压迫，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用宗教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⑤ “一班神甫牧师倚仗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兴词讼，欺压教外的人，无所不用其极”，而义和团事件，“也是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⑥ 至于帝国主义所灌输的白人至上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中国人，让中国人心理上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心理，否定中国的一切，迷信外国的一切，即“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9-37页。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③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1924年9月7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63-167页。

④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⑤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1924年9月27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2册，第163-167页。

⑥ 同前注。

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这种行为，在孙中山而言，是一种重大的“流弊”。^① 由此可见，在当时西化风气高涨的时空下，孙中山仍然力主反对全盘西化，孙中山更因此而发展出一套结合欧美的西方和亚洲的东方观点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学说，以作为其反制帝国主义，强国富民之理论依据。

三、孙中山的亚洲观点——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

总的来说，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政治重心，就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② 实践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可说是孙中山毕生所求的目标，^③ 亦是百年后当代学者仍称道孙中山，喻之为伟人的主要原因。这个为拯救中国，使中国现代化而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内容广博，提出虽已逾百余年，但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却仍然具有高度的实践性，足可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

三民主义学说主张中国之强盛，必先强调民族团结的民族主义，再进而强调民主的民权主义到强调促进人民生活福祉的民生主义，来一一加以实践完成。^④ 依孙中山所言，三民主义核心思想就是分别促进民有、民治和民享，并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精神的救

①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99-112页。

② “余之革命主义内容，赅括言之，就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已。”见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354-363页。

③ “我希望各同志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目的。我虽死，亦可瞑目”，见孙中山：〈促成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谈话〉（1925年3月11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649页。

④ 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的道理，原来是一贯的。如果要考究他们发生的次序，世界各个都是由民族主义进而到民权主义，再由民权主义进而到民生主义。”见孙中山：〈三民主义造就新世界之工具〉，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军政学界76团体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3册，第276-281页。

国主义。^① 简而言之，三民主义首先就是一个打不平的主义，为促进平等而生，即“民族主义是用来对外国人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用来对本国人打不平的，而民生主义是用来对大富人打不平”。^② 因此三民主义虽是三个主义而成，它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虽因时机的不同会有所偏重，但根本上非得整体地进行不可。^③ 学者贺凌虚认为三民主义可以用“平等和自由的主义”来概括之。^④

学者朱谌断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皆以民族主义为核心，为起点亦为最终目标。^⑤ 若深究孙中山的著述，他“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⑥ “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⑦ 等作为其革命之目标，可见孙中山一生之志业，乃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如孙中山所言：

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

-
- ① 见下列两段话：“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以自由、平等、博爱无异。”“什么是三民主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上文可分别见孙中山：〈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1921年11月梧州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69-272页；〈民族主义第一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3-12页。
- ② 孙中山：〈革命军不可想升官发财〉，1924年3月10日在广州对东路讨陈军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69-272页。
- ③ 贺凌虚：《孙中山政治思想论集》，第6页。
- ④ 贺凌虚：《孙中山政治思想论集》，第7页。
- ⑤ 朱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三民主义学报》，第15期，1992年，第25-62页。
- ⑥ 孙中山：〈国民党之奋斗之法宜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1923年12月30日广州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392-400页。
- ⑦ 孙中山：〈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致党员通告〉（1924年3月2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40-142页。

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①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就没有孙中山的建国运动，更没有继之而生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不但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体制，还影响了整个中国民族之发展方向。这个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一套结合中国传统和西方学说，符合中国社会特色的治国方针。如同孙中山所言：“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②如果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③他又说：

“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④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⑤；

“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大害的。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⑥

如此，若不能全盘西化，则所谓的中国特色的治国观，反制帝

①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0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31-140页。

②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99-112页。

③ 同前注。

④ 同前注。

⑤ 同前注。

⑥ 同前注。

国主义的方法，又是如何实施？

首先，在民族主义方面，孙中山主张**以积极的行动将国家各民族来加以整合成一个国族——即中华民族**，其具体的作法有四，其一为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二为恢复中国固有的智能，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识”，回复中国曾经领先全球的科技水平，^①其三为透过实施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使各民族在政治和经济权利上都平等，^②其四为让少数民族和平同化于汉族。

在孙中山而言，将国民整合成单一国族，依其实施的阶段来陈列，乃有以下不得不然的原由：强调国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要团结国人以挽救国家于危亡。孙中山认为，“民族就是国族”，^③

“如果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要挽救中国的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以防止实行帝国主义的列强瓜分灭亡中国。”^④

再说，孙中山的国族整合，并非就是要压制或消灭少数族群的文化，首先，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是强调“扶倾济弱”和“民族平等”，他一贯反对民族的压制，即“这种民族压制那种民族，压制愈利害，反动也愈利害。”^⑤更何况，“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族所独占。”^⑥

实行国族主义的第二阶段，**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平等**，“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⑦对于平等，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要中国和外国特别是英美等强盛国家趋于平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45-54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政纲〉，1921年2月1日在国民党粤省支部成立大会演说，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23页。

③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第3-12页。

④ 同前注。

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军政学界76团体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76-281页。

⑥ 孙中山：〈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1921年11月在梧州对中国国民党员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71页。

⑦ 孙中山：〈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致党员通告〉，第141-142页。

等的主义，^① 具体的作法，“就是振作国民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否则中国就不是世界上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世界上的国民”；^② 而对于自由，孙中山认为其时中国的地位如同次殖民地，要做各国的奴隶，比缅甸、安南、高丽等殖民地都不如，中国人就要成为一个很坚固的团体，使国家能够行动自由，如此中国便是个强盛的国家，中国民族才有真自由。^③

实行国族主义的第三阶段，**就是反对以帝国主义为中心，似是而非的全球化理论**，并锄强扶弱，为世界弱小民族打不平，促进世界民族之平等。对此，孙中山早就看穿帝国主义所鼓吹的“世界主义”，^④ 反映的是帝国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对全球的统治霸权，是一种强权主持的统治秩序：“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要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⑤ “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欧洲人所谈的世界主义，是强权无公理的主义。”^⑥ 而“列强以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是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

因此，“中国先把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四万万人的

① 孙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1924年4月24日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52-461页。

② 孙中山：〈中国内乱之因〉，1924年11月25日神户东方酒店对日本地区中国国民党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527-535页。

③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67-76页。

④ 当时并没有“全球化”这个词汇，世人多以“世界主义”来称之，“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才兴起的新词汇。

⑤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⑥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9-37页。

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① “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② 同时，孙中山也认为“济弱扶倾，才是中国人的天职，对于弱小的民族要扶持，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 “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才算是治国、平天下。”^③ 到了这个阶段孙中山对民族主义作了更进一步的诠释：“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④ 这个原则一经发表，就成为孙中山至死不渝的强烈信仰，^⑤ 而后孙中山所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本质上也是秉持这个精神而生。这个大亚洲主义，乃是号召亚洲人民以日本和中国为首加以联合起来，争取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压迫。^⑥

在民权主义方面，孙中山把民主解读为“人民管理政事的权力”，^⑦ 但提倡民权，“不可能完全仿效欧美，”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民国初年中国仿效欧美的代议政体，“它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⑧ 对此，孙中山认为民主不是只有选举权，只有选举权的民主是不够的，他主张人民除了选举权之外，也应有创制权，即推动立法之权；罢免权，即罢免不适任的官吏之权；以及复决权，即推动旧法律的废止或修改。这四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9-37页。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③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45-54页。

④ 孙中山：〈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1922年1月4日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306-308页。

⑤ 他晚年在国事如麻时还抽空发表文告呼吁世界弱小民族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阵线，足可见他对解放世界弱小民族的重视。见孙中山，〈呼吁世界弱小民族形成反帝联合阵线〉，1924年1月6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30-131页。

⑥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28日神户高等女校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535-542页。

⑦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55-66页。

⑧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95-112页。

权（按：即选举、创制、复决和罢免）合而为一，就是直接民权，亦为人民的四权。而政府的统治权，也必须分为五权，其中把本应属国会立法权力的监察权分离出来独立成一权，以防止国会因为党争而任意弹劾行政官员的乱象，把本应属行政权力的考试权（按：即官员选拔权）分离出来独立成一权，以防止行政权任人为亲，朋比为奸的乱象，如此成为一个拥有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政府体制，而当中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中国固有的东西”，^①其中监察权就是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考试权就是科举制度。目前台湾所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以这五权架构来组织政府的宪法，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结合中国传统和西方民主制度之政府组织法，它在台湾实行六十多年来，并无任何重大的阻扰，作为台湾政治稳定主要凭借，孙中山的治国观点，仍超越时代而生生不息。

虽然如此，由于中国人民普遍缺乏对民主的认识，孙中山当年也不主张冒然的民主化，五权宪法要在中国民主化的条件成熟之后，才能完整地实施，因此孙中山的民主观点，必须要依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渐次地发展，决非一步登天。所谓军政，就是用武力维系的极权统治时期，“以扫除国内的障碍，”^②训政就是训练人民了解民主，有限地应用民主权力的威权时期，如开放地方乡、县的自治权等，待时机成熟，最后才是完全实行民主的宪政时期。^③事实上今天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也是完全跟随孙中山所规划的民主化三个阶段来进行的。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渐次开放农村的选举，也有依循孙中山民主化途径的味道。

最后谈到民生主义，孙中山指它就是“发展人民的生活”，事实上也就是发展社会和经济，增进人民生活福祉的主义，对于这个主义，孙中山的定义较为笼统含糊，说它是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事实上它是一套结合包括资本主义在内，各个主义的国家发展方针，其中最主要的发展方针是：一、节制私人资本，压制富商的财富累积，以降低贫富差距，二、发达国家资本，建立大型的国营

①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113-118页。

②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4月12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623-625页。

③ 同前注。

企业以发展可以和外国资本家竞争的主要工业，其收入平均回馈给国民；三、平均地权，即在农村者，让耕者有其田，农民人人都是小地主，^① 在都市者，透过土地部份上涨的价格归国家公有的方式，压制土地的炒作，解决房屋问题，^② 四、开放外资投资中国，借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改善中国经济。对此，孙中山在其巨著《实业计划》中就主张“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③ 因此，孙中山乃邀请各国投资中国的建设，即“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利用此绝无仅有的机会以谋求世界之和平实现也。”^④ 然而，这个发展不是出让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⑤

当代西方学者 Marie-Cleire Bergere 指出，孙中山当年所要求的国际共同合作开发发展中国的政策，正是今天联合国组织经常实行的做法，足可见孙之远见，非当时同时代中国人所能及。^⑥ 孙中山相信，反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实行一套结合中国哲学和西方思想，加以独创而成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它是一个可以发展中国，让中国各方面都和列强平起平坐的指导哲学，^⑦ 作为中国第一任平民总统，孙中山为中国立下了一个独特的治国理论，其观点仍然可以精确地描绘当代的时局，作为近现代一位亚洲治国观的开创者，孙中山可说当之无愧。

① 孙中山：〈耕者要有其田〉，1924年8月21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95-498页。

②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145-157页。

③ 孙中山：〈实业计划〉（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423-549页。

④ 同前注。

⑤ 同前注。

⑥ Marie-Cleire Bergere（白吉尔）著，温洽益译：《孙逸仙》（Sun Yat-Sen），台北：时报，2010，第321页。

⑦ 孙中山：〈同胞要实行三民主义〉，1924年5月30日应上海中国晚报之邀播音于广州之留声机片断，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69-471页。

四、马哈迪对帝国主义的理解

马哈迪和孙中山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比孙中山更长的掌权时间（1981-2003），并在他的治理期间打造了一个首相权独大的威权体制，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把他的治国理念贯彻到全国。^① 如同 Zainuddin 所言，“马哈迪 1980 末一连串个人的政治胜利，已经让他可以近乎毫无阻碍的情况下实行他的愿景和计划，每一件事情都如其所愿地进行着，只有逐渐老化的年龄迫使他加快国家现代化的步伐。”^② 他这种个人化的统治风格，不仅是因为他是位“孜孜不倦的民族主义者”，^③ 相较前三任首相，专栏作家出身的他拥有塑造个人风格的论述能力，他一方面即能凑合论辩、理念与政策，拟出一套富有说服力的国家宏愿，另一方面又能在其任内建构出一套符合巫统政党利益，结合马来族群主义的伊斯兰化观点以作为巫统的统治基础。作为一个民粹的领袖，他也擅长利用巡回全国的演说来激励人心，这些面对群众的演说就成为其在政治危机时巩固权力的利器。^④

除了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压制异议的威权统治手段之外，马哈迪拥有其他两个较为为世人所熟知的特质，其一为在国际上敢怒敢言，为弱小国家打抱不平，敢于批评西方国家和白人族群主

① 对此，庄迪澎提到，“在马来西亚，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议题或管理积弊，大至经济政策，小至吉隆坡垃圾问题，往往在马哈迪表态后，都有了行事方针，各部会首长就按首相的指示办事。”庄迪澎：《给马哈迪的媒体操控算账：强势首相对弱势媒体》，吉隆坡：破媒体传播事业社，2004，第 5 页。

② Zainuddin Maidin, Wan A. Hulaimi Trans. *The Other Side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Sdn. Bhd, 1994, p. 148.

③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2002, p. 389.

④ 根据邱武德的整理，马哈迪喜欢直接面对群众，每每在全国选举之前就会来一场巡回全国各州城市的演说，惟在 1983 年以及 1991 年和王室冲突时期，以及 1987 年巫统党内分裂的时期他也发动了类似的演说。每一场演说都有电视现场直播。见 Khoo Boo Teik, *Paradoxes of Mahathis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esity Press, 1995, pp. 198-202, 208.

义的言行，此举使他在 1990 年代一跃而成为国际知名的领袖，^① 俨然是亚非发展中国家，“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② 或“亚洲的巨人”。^③ 其二是就是强调伊斯兰的治国哲学。

以研究马哈迪而知名的邱武德（Khou Boo Teik）教授认为马哈迪思想（Mahathirism）可分为五个中心部份，即：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伊斯兰、平民主义和威权主义（nationalism, capitalism, Islam, popu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④ Milne 和 Mauzy 则视马哈迪为积极的现代化推动者（An eager and dedicated modernizer）；他个人的构想往往就会成为国家的重大发展计划，^⑤ 他不隐藏他本身坚定的信念，并致力于透过无数的演讲和政策的落实来宣扬之。张景云亦形容马哈迪身上揉合了三个政治角色，第一个是马来民族主义者，第二个是现代化的策动者，最后就是务实派政客。^⑥ 惟邱武德将马哈迪形容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者，皆因其把族群的关系比拟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关系。^⑦

事实上，贯穿马哈迪思想的，仍然是其念兹在兹的马来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对内，就是追求马来霸权的领导，对外，就是反西方的帝国主义，前者固然为他带来种族主义的恶名，而后者，却为他赢得了众多国际友人的称誉，后者的光芒也往往成功掩饰了前者的不足。纵观马哈迪诸多丰富的言论和著述，马哈迪认为，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分成以下几个层面：

①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257.

② Tom Plate,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Doctor M: Operation Malays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1, p. 17.

③ Ibid., p. 91.

④ Khoo Boo Teik, *Paradoxes of Mahathirism*. p. 7.

⑤ R.S. Milne & Diane K. Mauzy, *Malaysian Politics under Mahathi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6.

⑥ 张景云：〈华团与政治：解去政治化的前景〉，何启良编著：《当代大华人政治省思》，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第 102 页。

⑦ 如在其早期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马哈迪承认在人种上马来人的竞争力、教育程度、智慧皆远比华人逊色，即相对于华人，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是属于弱势族群。因此，马来人需要被保护和被赋予持权，并藉此以提高其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这样族群间才能“平等”，两大族群才能整合起来。

其一，好战的帝国主义利用武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马哈迪认为亚洲人向来均尊重贸易伙伴，奉行和平贸易的传统。帝国主义为了垄断市场，却把他的贸易伙伴加以占领，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伴随贸易而来，对西方而言，“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帝国主义。”^① 对马哈迪而言，这个西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代表，就是美国。在他的眼里，美国完全不理睬世界其他国家的感受，一味地推行他的议程，或是用军事力量来威吓他国，寻求支配世界。^② 因此，美国所代表的，就是“旧欧洲帝国主义的改头换面”。^③ 尤其甚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十分好战，他们花费巨额的金钱只为了发展日新月异的尖端杀人武器，这些武器足以毁灭人类无数次，^④ 而因为他们的好战，“有数十万的人被屠杀，许多部族被灭绝，”他们又任意重划领土，任意将不同的族群聚集在一起，让许多脱离殖民的国家陷入内战的乱局，使他们一直保持借口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⑤ 马哈迪认为，这些战争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如美国侵略伊拉克就是一个失败的反恐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它不但激起穆斯林的愤恨，而且更助长了恐怖活动。因此相信军事至上和文明的冲突，是一种错误，对世界的和平无所帮助。^⑥

其二，西方利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来建构统治秩序：对此，马哈迪不讳言人类都生活在欧洲中心的世界（Eurocentric World），全世界都有欧洲主宰的痕迹，甚至欧洲的思想也影响了全球人类，^⑦ 是以，马哈迪认为西方所鼓吹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大企业独占

①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The Memoirs of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Kuala Lumpur: MPH Group Publishing Sdn. Bhd., 2011, p. 395.

② *Ibid.*, pp. 434-435.

③ 见原文：“It is the same old European imperialism manifesting itself in a new form”。见 *Ibid.*, p. 399.

④ *Ibid.*, p. 400.

⑤ *Ibid.*, pp. 396-397.

⑥ *Ibid.*, pp. 738-739.

⑦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马哈迪主张所谓的欧洲人是指“白种人”，其中也包括了美国人和澳洲人等，因此，他认为欧洲文明也包括了当代美国和澳洲等国家白种人的文明。见 *Ibid.*, pp. 389-390.

全球经济的过程，^① 西方过去先剥削东方国家的资源，再利用他们廉价劳动力来大力发展经济，^② 现在在壮大之后却又主张自由贸易来制约东方，而西方所主张自由贸易，如同大人和小孩在同一个球场上竞技，是一种西方合理化不公平竞争的借口，^③ 而西方一边鼓吹自由贸易，一边却又反对人民的自由迁移，更是一种双重标准。^④

其三，就是指西方白人至上的生活价值对亚洲国家的入侵：对此，马哈迪认为长期的白人殖民统治使马来人以至马来西亚人多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 complex），^⑤ 马来西亚各阶层人民都有盲目仿效欧洲人的倾向，^⑥ 惟从他们限制非白人移民的事证来看，马哈迪认为欧洲人事实上就是种族主义者（racialist），因此没有资格批评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⑦ 尤其甚者，欧洲的白人不单用种族主义来界定文明的优劣，还把他们的价值和制度强加在别人的身上。^⑧

依马哈迪之见，这些西方所强加在亚洲人身上的价值，可分成下列几项：其一就是当成他们信仰的自由主义和所谓的人权。^⑨ 对此，马哈迪表明每个民族都有他的价值，强加外来的价值在他们的身上是错误的。^⑩ 西方要求所有人都遵循他们的民主制度，“许多

① Mahathir Mohamad, *Reflections of A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2, p. 89.

②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Kuala Lumpu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1995, pp. 40-41.

③ Mahathir Mohamad, *Reflections of Asia*, p. 98.

④ Ibid., p. 10.

⑤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 648.

⑥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马哈迪主张所谓的欧洲人是指白种人，其中也包括了美国人和澳洲人等。见 Ibid., p. 385.

⑦ 原文：“The European in particular should have a closer look to themselves. They are all racialist, if not racist.” 见：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36.

⑧ Mahathir Mohamad, *The Way Forwar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p. 129.

⑨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72.

⑩ Tom Plate,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p. 81.

反对者因此而被加以杀害”，^① 这种行为反而伤害了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其次，是环保的理念，马哈迪认为北方国家是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却还发动抵制开发中国家的伐木活动，此举就是否定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脱离贫困、饥饿和疾病的权利，当他们否定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由，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自由？而这种价值上的压迫，就是帝国主义。^② 最后，西方也对亚洲传播了如自由性爱、裸露、同性恋、破坏公共财物的生活价值，这些败坏的道德都是西方所包容甚至鼓吹的行为，但对亚洲人如马来西亚人而言，这些行为都是对自由的滥用，是属于西方而非东方的价值，^③ 政府应该照顾人民的道德，拒绝这些败德的行为。^④

五、马哈迪的亚洲观点——马来伊斯兰的强国之路

和孙中山一样，马哈迪也有自己一套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结合西方思想的治国观点。这些观点大致而言可分成以下几项：

其一，为奉行“亚洲特色”的民主制度。马哈迪主张，世间并没有极端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会带来社会失序（social anarchy），^⑤

“自由必须要依环境和时代的变迁来作调整，故最好的社会模式是社会责任制（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⑥ 是以，“马来西亚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是不同的。”“民主不是宗教，我们必须检视我们的民主，人民和国家的福祉比民主更为重要，民主是为国家和人民而生，而不是为民主而生，如果民主的内容会伤害国家福

①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 393.

② Mahathir Mohamad,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Secon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Kuala Lumpur, April 26, 1992, in Govin Alagasari ed. *Mahathir: The Awakening*, Sabah: Uni-Strength Sdn. Bhd. 1994, p. 379.

③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77.

④ 对此，Mahathir 说“如果同性恋过于泛滥，会降低出生率”。见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p. 81, 92-93.

⑤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87.

⑥ Mahathir Mohamad, “World Press Convention”, Kuala Lumpur, September 18, 1985, in Govin Alagasari ed. *Mahathir: The Awakening*, p. 379.

祉，我们就必须以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为优先。”^① 而“马来西亚不止将大众的福祉置于个人的自由之上，也相信家庭、婚姻和保守的道德价值。”^② “因为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化，有权力的人民也会腐化”，因此人民的权力必须要受限制，^③ 政府有责任保护大多数的人民，^④ 因此西方诠释的人权观是东方所不能接受的。^⑤

尽管如此，马哈迪认可“人民有权利批评政府”，“如果马来西亚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人民就可以在选举的过程推翻它。”所以和“许多开发中国家比较起来，马来西亚是政治自由的。”^⑥ 在最近的一场访问中，马哈迪甚至更辩称，因为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让领袖下台，所以马来西亚不是威权体制，而过去他任内所犯下的，恶名昭彰的1987年大逮捕事件，是警方自主决定的作为，而非他的主张。^⑦ 显而易见地，马哈迪认为民主就是选举，其他都是次要，难怪马哈迪仍然辩称马来西亚的体制是民主的，“因为民主制度里头最大的自由，就是让人民有权利选择政府”，^⑧ 由此可见，马哈迪所谓的民主价值，是一种结合亚洲传统家父长式和西方民主选举的制度，然而倘若人民面临选举制度不公的威胁时，又该当如何？这大概不是马哈迪所考虑的范围了。

马哈迪另一套从“亚洲价值”出发的治国观点，就是实践性的马来伊斯兰观点。首先，作为一位非宗教教育出身的族群领袖，马哈迪从不讳言其对伊斯兰并无深入的了解，^⑨ 但却从不否认其作为

① Mahathir Mohamad, “Demokrasi dan Masa Depan Negara”, Ucapan di Perhimpunan Agung UMNO ke-50, 11 Mei 1996, in, Wan Mohd. & Hj. Nik Mustaffa (ed.), *Amanat Presiden* (主席的训词),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7, pp. 620-640.

②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78.

③ Mahathir Mohamad, “Jangan Lupa Daratan”, Ucapan di Perhimpunan Agung UMNO, 26 November 1995, in, Wan Mohd. Mahyiddin & Hj. Nik Mustaffa Yussof (ed.), *Amanat Presiden* (主席的训词), pp. 598-619.

④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76.

⑤ Ibid., p. 74.

⑥ Ibid., p. 93.

⑦ Tom Plate,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pp. 119, 182-183.

⑧ Ibid., p. 91.

⑨ 原文：“I do not claim to be an expert or an ‘Ulama’, an Islamic scholar, but it would be fatal for me to say that I am not qualified.”，见：Mahathir Mohamad.

穆斯林领袖的地位以及其对伊斯兰的虔诚信仰；^① 是以他的伊斯兰化理念与其说是他对伊斯兰认识的体会，不如说是作为一个马来穆斯林领袖而衍生的崇高使命与责任。他认为促进穆斯林地位的跃进和促进伊斯兰地位的提升是相辅相成；因此促进穆斯林现世的成就是为马哈迪伊斯兰化政策最主要的导向。在他刻意培育下，马来民族最重要的图腾——伊斯兰的影响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在马哈迪在位期间（1981-2003），史无前例地大幅实施了一系列伊斯兰化的国家政策，以致许多学者皆认为马哈迪担任首相期间就标志着马来西亚官方朝向伊斯兰化转变的年代，^② 而这个年代也被 Seyyed Vali Reza Nasr（2001）定义为马来西亚“伊斯兰化的时期（Islamization period）”。^③ 大体而言，马哈迪上台的第一个十年（1981-1990）就实施了许多突破性的伊斯兰化政策，亦大幅提升了伊斯兰的法律地位：较为显著的有如 1983 年设立国际伊斯兰大学（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IIU），伊斯兰保险公司（Syarikat Takaful Islam）和伊斯兰银行（Bank Islam Berhad, Islamic Bank），1984 年提出“在国家行政上

“Speech at the Oxford Centre for Islamic Studies, Oxford, U.K., 16 April, 1996”, in Mahathir Mohamad, *Islam: Misunderstood Religion*, Kuala Lumpur: Afro-Arab Centre, 1996, p. 1.

① 原文：“I hold very strongly to my religion.....”，见：Mahathir Mohamad, “Toleration and Moderation in Islam: Speech at the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October 5, 1998,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Islam and the Muslim Ummah: Selected speeches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0, pp. 105-116.

② 持此观点的学者不计其数，这里只列出几本主要参考著作：Tham Seong Chee. *Malays and Moderniz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65-268;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9-103; Hussin Mutalib. *Islam and Malay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7-151; Norhashimah Mohd. Yasin. *Islamization / Malaynisation - A Study on the Role of Islamic Law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1969-1993*,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6, pp. 197-202; Shanti Nair, *Islam in Malaysia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10.

③ Seyyed Vali Reza Nasr, *Islamic Leviathan: Islam and the Making of State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5.

吸纳伊斯兰价值政策（*Dasar penerapan nilai-nilai Islam*）”的国家政策（*Dasar Negara*），^① 1988年策动修订宪法第121之1(A)条文赋予伊斯兰法院独立裁判权，1988年宣布除伊斯兰节目外其余宗教节目均不得在电视和广播媒体播出等。^② 到了1990年代末期，马哈迪执政时期的伊斯兰化政策已经为他本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形象，凡此种种，皆深刻地影响了马来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广泛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社会面貌。这种结合成东方伊斯兰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为马哈迪赢得国际尤其是中东国家的赞赏。

在外交上，马哈迪又采取亲穆斯林国家的立场，如大量供应军火给波士尼亚的穆斯林反抗军，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不管美国的抗议而和利比亚、苏丹、伊朗、伊拉克等国维系良好经贸合作关系，^③ 凡此种种，作为一种挑战美国帝国主义的姿态，让马哈迪成功争取到众多穆斯林国家的认同。对此，Sibamurugan Pandian认为马哈迪的伊斯兰观点乃是依据他个人的诠释与理解，而非依照传统伊斯兰学者的诠释。虽然如此，马哈迪的伊斯兰化观点和他所提倡的伊斯兰化政策仍获得许多国际著名伊斯兰学者如埃及艾兹阿哈（*Al-Azhar*）大学前校长 Mohammad Sayed Tantawi 教授的背书，使马哈迪成为当代国际最知名的伊斯兰国家领袖。^④

① 1993年两位大专学者出版一部专书介绍马来西亚独立以来14项重大的国家政策，其中有6项重大政策是马哈迪执政时代的代表性政策，即“7千万人口政策”、“向东学习政策”、“公务员以身作则”政策、“私营化政策”、“2020年先进国宏愿政策”以及“在国家行政上吸纳伊斯兰价值政策”。见 Yusof Ismail & Khayati Ibrahim eds. *Dasar-dasar Kerajaan Malaysia: Tinjauan Menyeluruh* (马来西亚政府政策：一个全面的观察)。Kuala Lumpur: A. S. Noordeen. 1993.

② 以上所列举的伊斯兰化政策，前三项经常被视为马哈迪政府伊斯兰化政策的标志 (landmark)。见 Kamarulnizam Abdullah. *The Politics of Islam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3, p. 182.

③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pp. 258-259.

④ Tantawi 教授也是前埃及穆夫提（按：即伊斯兰大法官），是埃及最高权威的伊斯兰法官，他曾多次前来马来西亚。最近一次是2008年2月16日前来为世界艾兹阿哈大学校友大会揭幕，并获颁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每次前来都对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策大为赞许。当然也不吝于宣布马来西亚是“模范的伊斯兰国。”2008年1月17日他在艾兹阿哈大学校友会中说“因为马来西亚成功地让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和平相处，马来西亚不止是伊斯兰国，而是光荣的伊斯兰国 (glorious Islamic

最后，马哈迪另一个积极展现其“亚洲观点”的场域就是经济领域。它在国内的实践上，主要就是发达以马来人为优先的民族资本，发展大型工业，以及鼓吹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国外，就是提倡向东学习，积极谋求亚洲一体的区域合作。对马哈迪而言，要解决马来人和马来西亚人的“自卑情结”，首先就必须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方法之一为扶持、保护马来人的经济，然后再保护马来西亚企业，使它能和国际竞争，方法之二为建设大型工程，让世人对马来西亚刮目相看；如对于马哈迪所自豪的国家石油双峰塔（Petronas Twin Towers）的落成，马哈迪辩称，如果一个人是矮子，他就需要一个肥皂箱以便让人看得见，听得到，而国家石油双峰塔就是马来西亚的肥皂箱，同理也可证明在全亚洲最大的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布城（Putrajaya），国际水平的F1赛车场的承建，在各地兴筑巨型的清真寺等的建设上。

在扶助马来人的经济方面，马哈迪1983年所推行的国营企业私营化政策，更进一步塑造了大批的马来巨富。^① 巫统也在1972年10月2日设立了一个党营事业——舰队集团（Fleet Holding），此集团通过对各种工程的垄断在1980年代发展成国内主要的财团。^② 除此之外，马哈迪也不忘记全力发展国营企业，当中最成功

country)”。相关资料见 Sivamurugan Pandian, *Legasi Mahathir* (马哈迪的遗绪)。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Sdn. Bhd., 2005, pp. 178-179; “Tantawi: Malaysia is a Model”, Bernama (马新社), January, 17, 2008, <http://www.bernama.com.my/bernama/v3/news.php?id=314375>, 2008年3月4日。

- ① 以上来自马哈迪的演讲，他进一步说：“现在即使发生族群暴动，被烧的奔驰劳斯莱斯汽车有可能是马来人本身的”，依他的逻辑，新经济政策透过提升马来人的财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见 Mahathir Mohamad, “Hapuskan Politik Wang (消灭金钱政治), Ucapan di Perhimpunan Agung Khas UMNO (巫统特别代表大会演讲)”, Jun 19, 1994, in, Wan Mohd. Mahyiddin & Hj. Nik Mustaffa Yussof (eds), *Amanat Presiden* (主席的训词). pp. 567-577. 1994.
- ② 其旗下独占南北大道经营权的马友乃德公司（United Engineers Malaysia Bhd.）承揽了全西马来西亚绝大部份高速公路的工程，全马来西亚高速公路用户至今仍然每天要在全国三百个以上的收费站缴交过路费于该公司，这个庞大的过路费成为巫统重大的收入。见 Edmund Terence Gomez, “Capit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n, Jahara Yahaya, Tey Nai Peng, Yeoh Kok Kheng (eds). *Sustaining Growth, Enhancing Distribution: The NEP and NDP Revisited.*,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的当属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作为马来西亚最大型企业，国家石油公司多次扮演救助马来企业的角色。在马哈迪的努力下，马来西亚产生了一大批的马来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① 马哈迪始终认为，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实施这些偏袒马来人的，正面的歧视政策（positive discrimination），华人就会主宰所有的一切，如此反而破坏了国家的民族团结。^②

马哈迪对外最著名的经济政策，就是向东学习政策和以亚洲为主体的区域经济整合政策，所谓的向东学习，就是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先进国家为师的政策，简单来说，其最初就是指“学习日本的工作伦理和企业文化”，^③ 后来再扩张到经济上也较为成功的南韩和台湾。对此，马哈迪对日本产品的高质量和其强调工作效率、勤奋敬业、高度纪律、高度忠诚的工作伦理尤其称许，他自称曾经到过日本考察超过 50 次，每一次皆受到启发。有鉴于日本同样是来自于东方文化，“马来西亚人学习日本会比仿效西方的道德与文化更为容易”^④。同样地，日本和南韩资本主义的成功，也在于国家计划性地支持大企业，扶持大财团的策略，马哈迪也仿效此种方式，在 1980 年代打造了数个大规模的本土企业，并引进日本技术指导的制造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汽车工业。^⑤ 无论如何，根据马哈迪退休后的看法，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马来人缺乏积极学习的态度，这个政策的成效，最终不尽如人意，但马来西亚的确因此而作出了很大的改变。^⑥

虽然马哈迪从不隐藏他的马来族群主义，马哈迪任内的对外主张，却仍然多是以全体马来西亚人民为依归。对内，他以扮演马来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3, pp. 74-140.

① 一份数据显示，1970 年至 2000 年马来 / 土著族群的专业人士数量增加了 10 倍，华人和印度人只分别倍加 6 倍和 5 倍。见 Shyamala Nagaraj and Lee Kiong Hock,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engineering: Which Part of the Field Are We Levelling?”, in Jahara Yahaya, Tey Nai Peng, Yeoh Kok Kheng (eds). 2003, pp. 16-70.

②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p. 199-200.

③ Mahathir Mohamad, *Reflections on Asian*, p. 37.

④ Ibid.

⑤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p. 246.

⑥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p. 382-387.

族群的斗士见称，对外，却是个雄辩滔滔的马来西亚领袖，或甚至亚非开发中国的代言人。因此，马哈迪的国家发展方针，如同孙中山一样，是多元化且功利性的，不管是应用伊斯兰，维系威权政权，抑或是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马来人，和其他的马来西亚人带来尊严与荣耀，也让马来人，以及其他的马来西亚人能证明自己可以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平起平坐。^① 从这一点而言，联合其他国家以反抗“白人至上”的经济帝国主义，是有其必要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终马哈迪的任期，他都极欲打造一个纯亚洲国家的经济区域组织（如东亚经济组织—EAEG），并抗拒澳洲和新西兰对东盟（ASEAN）的影响。

虽然如此，Barry Warren 认为马哈迪的反西方的外交言辞和作为主要还是为了用来掩护国内的政务，让执政党有借口诉诸民族主义来赢取马来西亚人的支持，这些激烈批判西方的言辞，通常也用以作转移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② 如面对西方媒体对马来西亚压迫人权的批评，马哈迪通常就以“白人族群主义”的偏见，或“帝国主义”来回应之，而非澄清事实。^③ 事实上，Barry Warren 认为，马来西亚并不如一般国家想象中的反对西方，马来西亚和美国、英国等都一直都存有一些军事合作的协议，有些更是秘密的军事协议。^④ 因此马哈迪的外交手腕，也存在着浓厚的策略算计，无论如何，它也成功地为马哈迪赢取正面的形象。

六、结论

Ernest Gellner 主张民族主义出现在经济与政治皆处于劣势，文化上能够自我辨识的族群，这些人因为这样的处境被迫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⑤ 可见，不管是杜撰还是真实存在，特定的外在威

①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 159.

②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p. 255.

③ Ibid., pp. 244, 250.

④ Ibid., pp. 245, 251.

⑤ 葛尔纳，艾尼斯特著（Gellner, Ernest），李金梅译：《国族主义》（*Nationalism*），台北：联经，2000，第149页。

胁、恐惧与挑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原由，因为它在根本上提供了族群团结和动员的能量。对此，孙中山先生认为要拯救民族，必要提倡民族主义，^① 因此，“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② 事实上，民族主义也是政府团结国民，凝聚国民意志的要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威胁，就如同反作用力，带动了世界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也为民族主义国家的威权统治找到了相对统治正当性。

孙中山和马哈迪虽然是不同时代的政治领袖，但透过检验两人的论述与学说，我们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所传播的帝国主义从未消失，其种种特征仍然延续到今天。换言之，孙中山和马哈迪两人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和其特征皆有深刻的了解，足以提供吾人深入的参考。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亚洲国家独立自主，民族发展的最主要威胁，**它反映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价值文化上的压迫过程**。作为一个世代的开发中国家领袖，孙中山和马哈迪也深信强权就是公理的国际现实，因此也拥有务实的施政方针，即要利用帝国主义的支持来保护、壮大自己，又要团结弱小国家以防微杜渐；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皆以有限度地抵制利伯维尔场经济，合理化若干威权制度的存在，声援其他亚洲弱小国家来作为反制西方帝国主义，巩固民族资本的主要手段。

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人虽受教于西方的教育体制，亲眼见证帝国主义的霸气凌人，但却不迷信西方万能，在接纳西方的人文制度下，他们犹能发展出一套结合本土和西方价值，个人风格浓厚的治国观点，当中孙中山所秉持的理论泉源，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大传统，同样在马哈迪背后的，也有深厚的伊斯兰信仰文化。这两大源自亚洲的古文明，不论在人文思想抑或物质成就上，都曾经远远超越西方文明，它们遂成为两大政治巨人对抗帝国主义的信心来源和价值基础。凡此种种，皆有值得亚洲诸国领导人的效法之处。惟两人的论述却有几个关键性的差异，而这些的差异，足以诠释两人在亚洲政治发展史上的差别地位。

首先，在个人的政治条件上，孙中山一生颠沛流离，并没有比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1册，第3-9页。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1册，第22-29页。

马哈迪更多的执政机会，只留下大量的著述。虽则其对帝国主义的了解，和因应而生的国家发展的理论，多有个人的创见，它们的大部份也都被证明是跨时代的真知灼见，当中展现的大气魄亦是动人心弦，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毕竟没有经过他本人的真正实行，而且只局部在战前的中国和战后的台湾推行过，作为一个企图让世人遵循的“金科玉律”，仍有其不足。再者以孙中山的实证精神，如果他有幸实行三民主义，其内容必会不断地修正，可能不如今日所遗留的样貌。反观马哈迪执政 22 年，他拥有更多的实践基础，但却没有完成一套系统化，环环相扣的治国论述，即使是在相对较完善的伊斯兰论述上面，也充满许多选择性的诠释，因此在治国的主张上，马哈迪并没有开创性的主张，他可说是一位相信“没有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的务实主义或功利主义者。

其次，孙中山和马哈迪彼此之间在治国的论述面和实践面皆有明显的差异之处，第一个差异，就是对民族主义信仰的差异。在实践上，孙中山是完成了汉人族群主义的革命，将满人政权彻底推翻，使汉人完全掌握政权，再强调国族主义的族群整合。因为此时对汉民族的威胁已非国内而是国外，以同化的手段联合国内其他民族来巩固国家认同，遂顺理成章地成为孙中山民族主义观的最后阶段。重要的是，孙中山反对强制力的同化政策，而是主张自然的同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民权主义的实施，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都是平等的。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将其他族群加以同化并不影响汉民族的主体特质，反而更加壮大汉民族的文化内容，这是孙中山强调同化的信心基础。

反之，马哈迪抗拒族群同化，努力巩固族群边界以维持一个在族群共治下，马来族群领导霸权的体制。在这个情况下，他对族群同化的国族主义观，纵然有所支持，亦是消极的。^① 因为担心破坏马来人固有的文化特质（按：换言之就是信心不足），马来人不愿意同化非马来人，反之非马来人也抗拒被马来人同化，如此一来各自的族群都徘徊在“族群优先”或“国族优先”的命题中打转，国家就在这种族群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下发展下去，因此所谓的国族，变成一个文化基础薄弱的马来西亚意识，这个现象在建构对抗帝国

^① 尽管他在 1991 年提出 2020 年先进国宏愿的目标，当中有提到打造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但很快的就被予以淡化。

主义以及巩固国民团结的论述上，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长期过度厚待马来族群的经济和政治方针，也早已让国内无数的非马来人菁英透过移民出走投入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去而不回了。

换言之，孙中山一生所追求的，乃是实现三民主义，使全国人民成为一个达成政治经济权利真平等的国族，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①而这种平等，根本不会因为族群出身的不同，或族群认同的歧异而有所差别。反之，马哈迪在任内透过加强实施各种偏袒单一族群的经济政策，^②再三维护甚至扩大了马来族群的特殊权利所施以的范围，不但加剧了国内族群待遇的不平等，也塑造了一批和执政党共生的马来富裕阶层，但随着马来族群比例的快速上升，^③在资源有限，以及缺乏民主制衡的环境下，这种偏袒单一族群的经济政策再也无法使更多的人受惠，最终得利的仍然只是占人口极少数的朋党。

至于孙中山和马哈迪治国观点的第二项主要的差异，就是对民主宪政的诠释。如前所述，孙中山很明确地反对“民主就只是选举”的主张，他所主张的民主体制，是立基于“平等和自由的主义”，在一定的时空下，孙中山也认可威权政府甚至是军政府的存在，惟它们的存在是有阶段性的，等到时机成熟，还是要实行“完全民主”的五权宪法。反之，马哈迪 22 年的治国生涯中，在国家没有大动乱的情况下，一再地修改宪法扩张首相署的行政权，国家

① 孙中山：〈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1922 年 1 月 4 日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 3 册，第 306-308 页。

② 如对于他任内大力推动的国营企业私营化的政策，马哈迪就明白地说这个政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土著的商业股票占有率。惟许多获得股票分配的土著却为了快速致富又把股票卖给非土著套利，因此最终土著的股票占有率仍然无法提升到预期的 30% 目标。见 Mahathir Mohamad, *The Way Forward*, pp. 89-108.

③ 在各族群出生率不变的情况下，预计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将会在 2020 年左右逼近 70%，2050 年左右更会超越全国人口的 80%，这个人口比例已与独立时期仅仅过半的比例相去极远，届时马来人和原住民的各项特权将会成为国内大多数人的普遍权益，已没有什么“特殊性”，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无法持续提供如此众多人口的补助和优惠，因此最后所谓偏袒马来人的经济政策，受惠的将只是少数的马来族群和相关的朋党，当然，更会造成对少数族群的持续歧视，这种有违常理的政策，应有再被检讨的必要。

体制也日渐威权化，甚至日渐伊斯兰化，形成民主倒退的现象，而他个人却仍然坚信这个体制是为了马来西亚人民的福祉。他仅仅以马来西亚有“民主选举”的要件来判定马来西亚是民主体制的理由，也未免过于牵强。这种独特解释，实和孙中山的主张大异其趣，我们只能说，那是他个人独特的“亚洲价值观”了。

参考文献

1. Daniel Chirot & Clark McCauley 著，薛绚译：《为什么不杀光：政治大屠杀的秘思》（*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台北：立绪，2007。
2. 葛尔纳，艾尼斯特著（Gellner, Ernest），李金梅译：《国族主义》（*Nationalism*），台北：联经，2000。
3. 贺凌虚：《孙中山政治思想论集》，台北：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1995。
4. 华中兴：〈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本源初探：种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思与言》，1992年30卷第2期。
5. Marie-Cleire Bergere（白吉尔）著，温洽益译：《孙逸仙》（*Sun Yat-Sen*），台北：时报，2010。
6.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台北：远流，1998。
7. 秦孝仪编：《国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8. 王晓波编著：《孙中山思想研究》，台北：问津堂书局，2003。
9. 杨天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孙中山与民初政局》，台北：风云时代，2009。
10. 曾纪鑫：〈孙中山：民国之父〉，《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台北：远流，2009。
11. 张景云：〈华团与政治：解去政治化的前景〉，何启良编著：《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
12. 郑良树：〈保皇党及革命党对新马华教的影响比较〉，张希哲与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
13. 朱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三民主义学报》，第15期，1992年。

14. 庄迪澎：《给马哈迪的媒体操控算帐：强势首相对弱势媒体》，吉隆坡：破媒体传播事业社，2004。
15. 庄政：《孙文思想与政略》，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
16.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17. A.P. Thornton,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8.
18. 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6.
19.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0.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LB, 1980.
21.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2002.
22. E.M. Winslow,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Theories of Power*, New York: Octagon Book, 1972.
23. Govin Alagasari (ed.), *Mahathir: The Awakening*, Sabah: Uni-Strength Sdn. Bhd., 1994.
24.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 Hashim Makaruddin (ed.), *Islam and the Muslim Ummah: Selected Speeches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0.
26. Home page for Paul Brians, http://public.wsu.edu/~wldciv/world_civ_reader/world_civ_reader_2/kipling.html, 2011年6月23日。
27. Hussin Mutalib, *Islam and Malay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 Hussin Mutalib, *Islam in Malaysia: From Revivalism to Islamic Stat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9. Iain Mclea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 Jahara Yahaya, Tey Nai Peng, Yeoh Kok Kheng (eds.), *Sustaining Growth, Enhancing Distribution: The NEP and NDP Revisited*.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3.
31. John A. Hodson, *Imperialism, A Study*, New York: James Pott and Co, 190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obson/1902/imperialism/pt1ch1.htm>, 2011年6月23日。

32. Kamaruddin M. Said, *500 Tahun Melayu Menghadapi Cabaran* (马来人面临挑战五百年), Shah Alam: Kris Publications Sdn. Bhd, 2004.
33. Kamarulnizam Abdullah, *The Politics of Islam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3.
34. Khoo Boo Teik, *Paradoxes of Mahathis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esity Press, 1995.
35.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The Memoirs of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Kuala Lumpur: MPH Group Publishing Sdn. Bhd., 2011.
36. Mahathir Mohamad, *Islam: Misunderstood Religion*, Kuala Lumpur: Afro-Arab Centre, 1996.
37. Mahathir Mohamad, *Reflections of A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2.
38.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Kuala Lumpu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1995.
39. Mahathir Mohamad, *The Way Forwar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40. Norhashimah Mohd. Yasin, *Islamization / Malaynisation - A Study on the Role of Islamic Law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1969-1993*,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6.
41. R.S. Milne & Diane K. Mauzy, *Malaysian Politics under Mahathir*, London: Routledge, 1999.
42. Sayyed Vali Reza Nasr, *Islamic Leviathan: Islam and the Making of State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3. Shanti Nair, *Islam in Malaysia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1997.
44. Sivamurugan Pandian, *Legasi Mahathir* (马哈迪的遗绪),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Sdn. Bhd., 2005.
45. "Tantawi: Malaysia is a Model", *Bernama* (马新社), January, 17, 2008, <http://www.bernama.com.my/bernama/v3/news.php?id=314375>, 2008年3月4日。
46. Tham Seong Chee, *Malays and Moderniz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7. Tom Plate,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Doctor M: Operation Malays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1.
48. V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London: Junius Publications Ltd, 1996.
50. Wan Mohd. & Hj. Nik Mustaffa (ed.), *Amanat Presiden* (主席的训词),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7.

51. Yusof Ismail & Khayati Ibrahim (eds.), *Dasar-dasar Kerajaan Malaysia: Tinjauan Menyeluruh* (马来西亚政府政策：一个全面的观察) .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3.
52. Zainuddin Maidin, Wan A. Hulaimi Trans. *The Other Side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Sdn. Bhd, 1994.



真实生活的抒情体现 情感需求中审美表达 ——藏族民歌中的民俗事项透析

栗 军

内容摘要: 藏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他们用口头民歌来记录民间历史。藏族民歌中所呈现的民俗特征极为丰富多彩, 并体现在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从口头民俗、风俗民俗和物质民俗等三大民俗类型入手, 深入分析了藏族民歌中的各种民俗事项, 从中可以看出藏族民歌表达了藏族人民最本真的生活状态, 也反映了他们真诚的情感需求, 以及藏民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具有西藏地域色彩的独特审美追求。

关键词: 藏族民歌; 民俗; 真实; 审美表达

作者简介: 栗军,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西藏文学研究。邮箱: xzmylijun@163.com

Title: Lyric Embodiment of the Practical Life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Emotional Aspirations –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olk Items in Tibetan Folk Songs

Abstract: The Tibetans are a music and dance loving group of people, who uses oral folksongs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their race. These songs provide rich and colorful descriptions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s manifested in all aspect of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i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elements embodied within the Tibetan folksong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ree distinct genre, namely, oral, custom and material folklore. From these folksongs we get a glimpse of the most basic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Tibetan way of living, of how the Tibetan express their sincere emotional aspirations, and how over centuries

they have crafted a uniquely colorful Tibetan style of aesthetic pursuit.

Keywords: Tibetan folk songs; folk customs; reality; aesthetic expression

Author: Li J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Tibet. Major area of research: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Tibet literary studies. Email: <xzmylijun@163.com>

藏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藏族民歌也像草原上的格桑花一样随意采撷即是。藏族民歌也是最能体现藏民族丰富多彩的人生事项，最能体现他们多彩多姿的民俗生活。在这些民歌中藏民族是如何表达他们的生活，如何体现他们的情感和特有的审美取向，笔者试图从民俗的不同类别中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深入的认识。民俗的类型通常分为口头民俗、风俗民俗和物质民俗。^①不同类型的民俗在藏族民歌中都有体现。

—

口头民俗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和保存的民俗事项，主要包括神话、故事、传说；谚语、谜语、俗语词、歇后语；民歌、民谣、故事歌、史诗等。[1](45) 民歌本身就是一种口头民俗，在藏族人民的生活无处不在，藏族有一句谚语说：藏族人一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说的就是民歌在人民生活中极为常见，民歌也必然成为一种最为常见的民俗事项。藏族民俗在其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等诸多形式中也都有大量体现。

西藏的大多数神话，是以民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如藏族民歌《世界形成歌》、《鸟在树上说世界》、《宇宙成土石》、《世界姻缘关系》、《五个蛋排上用场》等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藏族人民对世界的解释和认识，而民歌就成了神话的载体，如一首昌都民歌

① 王娟：《民俗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页。本文所有[1]均指此书，（ ）指其参考页数。

《世界怎么形成的》：

领：世界没有形成时，
那是个什么样子？
众：世界没有形成时，
没有舞蹈，也没有歌曲。
领：世界怎么形成的？
众：世界是风变成的。^①

民歌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回答了万物的存在，空气的循环等等世界形成的方式。再如这首山南民歌《五个蛋排上用场》：

第一个蛋派往天空，
天上群星由此而来；
第二个蛋派往拉萨^②，
拉萨人群由此而来；
第三个蛋派往琼结，
琼结人清秀由此而来；
第四个蛋派往雅隆，
五谷齐全由此而来。[2](74)

用蛋来解释星星、人、五谷，甚至人的长相的由来。藏族人民就是以民歌的形式来解释万事万物的形成。老百姓不仅用民歌一代又一代把对世界的看法传承下去，这里不仅有对世界认知，更多的是对世界浪漫抒情式的想象，体现了藏民族特有的浪漫气质。

传说、故事也是一种重要的口头民俗形式。“传说同神话一样，是讲述者信之为真的叙事散文体故事，但与神话不同，其内容一般是世俗的，背景不甚古远，地点也是平常的。传说有时被称为

^①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西藏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北京：中国 ISBN 中心出版，1995 年，第 63 页。本文所有 [2] 均指此书，（ ）指其参考页数。

^② 拉萨、琼结、雅砻均为西藏地名。

民间的历史。”^① 西藏的传说、故事大多发生在藏区这片广阔的青藏高原上，在数量上可谓浩如烟海，而用民歌来传唱传说、故事，也是藏族人民习以为常的事情。藏族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大都成为人们的歌唱对象，如《文成公主的歌》、《噶尔东赞的歌》、《玛尔巴的歌》、《米拉日巴的歌》、《唐东杰布的歌》等，多得不胜枚举。如一首拉萨民歌《请求公主嫁到西藏来》：

请求公主嫁到西藏来，
请求甲萨拉姆^② 嫁西藏。

越过贡嘎山的山后边，
有一百座幢和经幡来迎接她；
到了圣地拉萨的时候，
有一百位挽发髻的贵族来迎接她；
进了红色大门的时候，
团团云朵般的供桑迎接她。[2](640)

就是传唱文成公主嫁给西藏的松赞干布时隆重而热闹的场景。

“谚语就是用一句结构完整的话来概括真理或哲理，” [1] (88) 藏族的历史典籍中有大量谚语，如《松巴谚语》、《喻法宝聚》，甚至《格萨尔史诗》、《米拉日巴传》、《猴鸟故事》等等^③，藏族人多认为，谚语能表现一个人学识。在藏族民歌中，也有一些谚语类型句子出现。如藏族民歌中的训诫歌、讽喻歌中就有大量谚语，如一首日喀则民歌《行有马来坐有垫》：

行有马来坐有垫，
脚下的鞋子不能缺。

① 扬·哈罗德·布鲁范德：《新编美国民俗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本文所有[3]均指此书，（ ）指其参考页数。

② 萨拉姆：藏语发音，意为汉后仙女，指文成公主。

③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藏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597页。本文所有[4]均指此书，（ ）指其参考页数。

虽有恩重父母亲，
终身伴侣不能缺。

虽有鲜肉和美酒，
醇香糌粑不能缺。[2](551)

一首歌中有三句都是谚语形式，表达的都是最朴素的道理。再如一首阿里地区的民歌《疯子的行为》：

当结交众多朋友时，
偏听偏信是疯子的行为。[2](553)

这真理简单纯粹，在藏族训诫歌中比比皆是。在讽喻歌中也有大量谚语，有的用总有一天会褪色的经幡，来说明光鲜亮丽不是永远的；有的用十五的月亮，虽然明亮，但它的光却是太阳给的，来说明有些人的成就是别人给的。而谜语、歇后语、绕口令等在形式上比较固定，在藏族民歌中较少呈现。

“史诗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和保存的长篇复合故事歌。”[1](137)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内容广博、结构宏大的英雄史诗，可以公认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史诗本身是口头流传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韵散结合的形式，很多部分用说唱的形式，和民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便如此，民歌中，并不是讲唱史诗《格萨尔王传》一部分情节，而是完整的一首首民歌，在这些民歌中格萨尔作为一个神，可以护佑百姓，让人们农业丰收、畜牧发展，让房子更亮堂，让婚礼更吉祥，让小伙更英俊，让孩子健康成长，让美酒更香甜，因而藏族民歌中涉及格萨尔的很多，甚至还有其妃子森姜珠牡以及其他人物。如一首山南地区的农田歌《辽阔的农田》：

在那田里引水浇灌，
好似格萨尔穿铠甲。

……

左边山头牵来白犏牛，

右边山头牵来黑犏牛，
黑白犏牛双双压牛轭；
格萨尔王来当扶犁人，
森姜珠牡来当撒种手，
青年男女豪杰耙农地。[2](92)

这本是一首农耕时开镰仪式的歌，但却请到了格萨尔大王和他美丽的王妃森姜珠牡，可见史诗这种民俗事项在民歌中也是随处即兴使用的。再如一首阿里地区的儿童成长仪式歌《格萨尔大王前来做陪伴》，提到孩子从一岁到三岁的成长过程中都有格萨尔作伴。

来到三山山顶上，
帽上的花翎没丢过。
格萨尔大王前来做陪伴，
所有儿童都来陪着玩。[2](227)

从这里不仅能看到史诗这种民俗事项在民歌中广泛的使用，也能够体现出藏族人民的观念习俗，格萨尔作为无所不能的战神，藏族人民千百年来的精神领袖，他会在老百姓的最底层、最普通的生活中出现，让一个孩子健康成长，陪伴老百姓度过一个又一个节日，让人们痛饮美酒，让农牧业生产顺利丰产，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种情感需求，是藏民族渴望丰收、安宁、富足的一种美好愿望，也是藏民族的最本真的审美表达。

二

风俗民俗有时也叫习惯民俗，指在某种文化传统中，以风俗的形式流传和保存的民俗事项，主要包括迷信和宗教信仰、民间游戏、民间节日、民间仪式、民间舞蹈等。[1](160)

说起迷信和宗教信仰，在藏地藏族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但在其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也曾信仰过原始苯教。因此，藏族人民的佛教信仰相对比较复杂，有很多原始崇拜和苯教色彩成分，但从其民歌中显现的则是更为质朴的信仰形式，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

面。藏族民歌中专门有一类就是宗教仪式歌，它可以歌唱佛教寺庙、歌唱佛法、歌唱空行母；也可以歌唱吉祥、歌唱高寿等等。在传说故事歌，风物歌、说宝物等民歌中也多是和宗教有关的歌唱。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干任何事情也都和宗教有密切关系，如生产劳动中，在农业区希望祈福后能够生产丰收，如一首扬谷时的山南地区民歌，就希望“金刚佛来扬扬” [2](114)。在牧区请来仙女，请三宝“祝愿家庭兴旺起来” [2](156) 拉萨人唱自己住在拉萨很舒服，因为

天空像八宝轮，
希望风调雨顺；
地像八瓣莲花，
希望获得丰收。 [2](733)

宗教在民歌中是自然而然的体现，因为生活中宗教无处不在。而宗教在儿歌中也有体现，如一首山南地区儿歌《孤儿》：

有父母的孩子，
像金佛般抬起，
无父母的孩子，
像皮风箱压起。 [2](957)

这里把有父母的孩子的状态比喻成抬起金佛，显然随处可见的宗教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民间游戏，藏族也不例外，在藏族民歌中，藏族儿歌有很多具体游戏的描述。如《跳绳歌》出现拉萨、日喀则地区，内容形式也各有不同，有问答式的，也有边跳边唱的，内容上除了有“左边转”“右边转”等比较适合跳跃时唱的词语外，其他的内容涉及地方、小伙、动物、大海等。如一首：

滴水成海快来跳，
孔雀头上转转身，
先转身来右边转，
再转身来左边转，

一杆经幡插左边。[2](950)

除了跳绳歌，还有玩小丸石歌，玩跨小渠歌等边唱边玩的儿歌。

藏族的民间节日非常多，有和宗教有关的拉萨传召大法会、花灯节、送魔节、扎寺伦布寺晒佛节，也有和生产有关的望果节和休闲娱乐有关的林卡节、沐浴节、雪顿节等。一年里西藏地区大大小小的节日有一百多个。很多民歌都是在过节时唱的。藏族在过年期间就会载歌载舞，尽情享受放松，很多舞蹈歌、酒歌就是这节庆时间唱起来的。如“果谐”这种在西藏农牧区广为流传，而且是一种大型的、野外跳的圆圈歌舞形式，就是在过年、节庆的时候进行的。如一首山南地区的果谐的开头就是这样唱的：

如果打开歌的门，
要在雪山见人，
雪山狮子来跳舞，
会唱的人来唱歌，
不会的人观赏乐。[2](10)

只要有节庆仪式等活动时，就会唱起民歌。如阿里地区的一首《今天是吉日》的民歌，就是在开镰耕种时完成的。

藏族的仪式更是少不了民歌。这些仪式歌涉及满月、百岁、周岁、嫁娶等人生仪礼，还有重大活动的入席、搬新房等世俗生活仪礼，以及登基、供神等宗教仪礼。如一首日喀则地区民歌《新房中住着供养天女》：

雪山环抱的高原上，
建起了四柱八梁新房。
新房中住着供养天女，
供养天女用着供品，
种姓殊胜的空行女供奉佳品。[2](269)

再如一首婚礼仪式歌中的祝福：

西藏平安快乐，
法王登上宝座，
汉地龙子皇宫，
宝贝登上宝座。
宝贝登上宝座，
主家幸福美满。
主家幸福美满，
鬼神也感到快乐。
鬼神感到快乐，
幸福常在人间。[2](256)

从这些民歌中也可看出藏族在仪式中对宗教特别敬畏，即使在婚礼仪式上，也祈求鬼神降福。

西藏被称为“歌舞的海洋”，有歌的地方就有舞。西藏民间舞蹈形式“果谐”、“谐青”、“果卓”、“日巴舞”、“囊玛”、“堆谐”[2](2-3 前言)等都歌舞兼备。如“果卓”就是圆舞，是由多人围成圆圈进行的弦歌舞蹈，有的地方叫“锅庄”。它有两种舞蹈形式：一种腰间系小鼓，一面唱一面跳舞；另一种与果谐相似，但曲调和脚步节奏不同，内容大部分以赞歌为主，舞蹈也在野外进行。[2](3 前言)有一首林芝地区的锅庄《说跳就要跳》：

第一个锅庄说跳就要跳，
一锅庄跳到印度好地方，
十八位成道的人来观赏，
我们奉献锅庄请欣赏吧！[2](33)

后面依次说到了拉萨、昌都、汉地也是好地方，也请这些地方的人来欣赏锅庄，而歌曲的重复，都是为了配合舞蹈。藏族民歌中的风俗民俗虽然无所不包，但它是藏族人民真实生活的表现。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游戏、节庆仪式、民间仪式、舞蹈等都表现了他们的真实质朴的民俗。

三

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物质民俗范畴。其实物质民俗包罗万象，但主要可以归结为民间美术、民间饮食、民间服饰、民间建筑。

说到民间美术，置身于西藏，可以感觉到强烈的美术色彩。在藏族民歌中虽然没有专门为唐卡、绘画、手工艺术品进行歌唱，但渗透民间美术民俗事项的却也不少。如佛教中吉祥彩箭、幢幡、长寿宝瓶、吉祥八宝图案等，日常生活中龙凤彩绘的瓷碗、彩色的氍毹、漂亮的服饰、装饰都有涉及。

藏族民间饮食在民歌中也有体现。藏族人喜爱喝酒，更喜欢自己独有的青稞酒，有关酒这种民间饮食在藏族民歌中就颇为丰富。如一首山南民歌《白色青稞酒》的酒歌这样描绘：

醇香的甘露美酒，
三天留在陶锅里；
流出桶嘴似野马，
流入湖中如湖泊；
谁人不爱饮美酒，
格萨尔王爱喝酒；
谁人不爱唱山歌，
森姜珠牡爱唱歌。[2](597)

而藏民族也是以青稞作为主要的粮食来源，在藏族民歌中随处可见，有问青稞来源的，也有吃炒青稞的，如一首《要吃炒青稞》：

中午嚷着要糌粑，
要吃大糌粑团团；
炒的青稞和豌豆，
当做零食不断吃。

今年播种的地面，
那麦子长得最好；

转世登上宝座时，
可以制作油炸果。[2](98)

这里西藏特有的糌粑、炒青稞、炒豌豆、油炸果等特有饮食民俗都在民歌中得到体现。独特饮食民俗是青藏高原独特地理气候所赐予的，藏族人民也在民歌中把它们表现的淋漓尽致。

由于地理环境的的不同，藏族的民间服饰花样种类也较多，如一首山南民歌《说服饰》：

我并不是后藏人^①，
后藏服饰我知道；
若要说后藏服饰，
头上珠冠耸又耸。

我并不是康区人，
康区服饰我知道；
若要说康区服饰，
红发丝穗飘又飘。

我并不是山南人，
山南服饰我知道；
若要说山南服饰，
氍毹衣褶摆又摆。

我并不是羌塘人，
羌塘服饰我知道；
若要说羌塘服饰，
身上皮袄摇又摇。

① 后藏、康区、山南、羌塘都是藏区地名，后藏是指西藏日喀则地区。康区是康巴地区的简称，主要指四川甘孜、阿坝，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羌塘是指藏北高原。

我并不是拉萨人，
拉萨服饰我知道；
若要说拉萨服饰，
毛料藏袍重又重。^①

这首歌把不同地区的服饰特点鲜明简洁地表达了出来。藏族民歌中对氍毹，对帽子、靴子、耳坠、项链等的描写也很多。如日喀则民歌《壮年的装饰》：

壮年头上合适的，
一是黄碗大帽；^②
壮年耳上合适的，
二是松石耳坠；
壮年脖上合适的，
三是项盒、九眼珠。[2](888)

就描绘了一个藏族壮年人的服饰，这里的黄碗大帽、松耳石、九眼珠都是藏族人民喜爱而珍贵的饰品，从另一方面也看出了藏族人民穿衣打扮的审美倾向。

藏族民间建筑别具一格，在藏族民歌中也有大量体现。由于藏区大多属于广阔的草原，在野地或者林卡搭建帐篷野营，是藏族人民普遍的民俗，所以，藏族民歌中有一类帐篷歌专门叙说这种民间建筑民俗，反映了老百姓对帐篷的感情。如一首《黑帐篷》：

牦牛的黑帐篷里外美，
外美是马牛羊圈围着它，
里美是堆满色酥油，
一眼看到畅饮茶和酒。[2](830)

西藏的民间建筑除了帐篷之外，还有很多建筑形式，如石头房和木

① 〈说服饰〉，《邦锦梅朵》，1985年第1期。

② 黄碗大帽：原西藏地方政府僧官戴在发髻上的黄色毛织小帽，上大下小，平顶，形如浅碗。

质房。房屋也有很多值得夸赞之处。如山南民歌《柱子的底座是红珊瑚》：

新建的房子真漂亮，
我愿献上三句赞美语。
柱子是用黄金铸，
房梁是用玉石打，
柱子的底座是红珊瑚。
新房坚固如高山，
高山矗立永不动，
倘若一朝真动摇，
但愿倒向仇敌边。[2](270-271)

藏族人民的房子不一定是黄金柱子，玉石房梁，红珊瑚座底造的，但通过歌者从一个侧面也表现了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求。

藏族民歌中所呈现的藏族民俗事项可谓丰富多彩，因为藏族就是一个用口头民歌来记录民间历史的民族。民歌表达了藏族人民吃、穿、住、行、娱乐方式等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了他们真诚的情感需求。他们爱生活，有自己崇拜的神灵，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分析这些藏族民歌的民俗事项，可以了解藏民族的民间历史，也可以看出藏民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具有西藏地域色彩的独特审美追求。

参考文献

1. 王娟：《民俗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西藏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北京：中国 ISBN 中心出版，1995年。
3. 扬·哈罗德·布鲁范德：《新编美国民俗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4.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藏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5. 〈说服饰〉，《邦锦梅朵》，1985年第1期。



试论当代中国之“盗墓文学”

黄 华

内容摘要: 盗墓文学作为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一支生力军, 虽然自诞生起不足十年, 但已经从文学领域走入动漫、游戏、影视等更广阔的文化市场, 形成一条经济效益和人气都不容小觑的文化产业链。本文梳理了“盗墓文学”概念的形成、盗墓文学流行的原因、局限性及其发展瓶颈, 借以探讨其未来的发展以及这一文化现象背后折射出的当代通俗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 盗墓文学; 《鬼吹灯》; 《盗墓笔记》; 网络文学

作者简介: 黄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女性文学。邮箱: huanghua2021@126.com, huanghua@solcnu.net

Title: A Discus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omb Raider” Literature

Abstract: Tomb Raider literature is a new energizing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et literature. Founded just 10 years ago, its has moved from the literary world into the mass culture of comics, games, and movies.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an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highly popular product in the wider 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The paper unpacks the concept of “tomb raider literature”,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its popularity, and the factors inhibiting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the future of this genre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we can gain a picture of how the contemporary popular literature production is being transformed.

Keywords: tomb raider literature; Gui Chui Deng; The Note-Taking of Graver Robbers; web literature

Author: Huang Hu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eminist literature. Email: <huanghua2021@126.com>, <huanghua@solcnu.net>

谈及当今中国文坛，人们大多绕不开一种新的类型文学“盗墓文学”。这种类型文学是中国独创的，堪与西方通俗文学中的僵尸、吸血鬼系列相媲美。2006年一部在网上连载的小说《鬼吹灯》，使盗墓文学横空出世并风靡一时。而今，国内各大文学网站均为盗墓文学开辟独立的板块，盗墓文学不仅自成一派，更发展出一条“网络文学—实体书—同名漫画—网络游戏—有声读物——影视作品”完整的产业链，其经济效益和人气指数均不容小觑。与此同时，盗墓文学所引发的争议从未停止过，“盗墓”本就是不光彩的行为，它与传统伦理、法律的相悖，使其自诞生起便饱受学界指责，但这未能阻止盗墓文学迅猛发展的势头。2014年两部由盗墓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鬼吹灯》和《盗墓笔记》先后开拍。由万达、华谊、光线联合出品，乌尔善任导演，著名影星陈坤、黄渤、舒淇等主演的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预计于2015年底与观众见面；由星皓电影、欢瑞世纪出品的《盗墓笔记》预计将于2016年夏天公映。随着相关影视剧的陆续开拍和上映，盗墓文学势必会引发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今年夏天开播的网剧《盗墓笔记》已经显示出盗墓文学巨大的市场号召力，网剧开播首日点击量便突破一亿。因而，探讨盗墓文学的流行原因、风格特色、生产及接受机制对于探索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何谓“盗墓文学”

盗墓文学最初的形式是网络上连载的盗墓小说，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点击量而成为文坛热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从“小说”发展成为“类型文学”，“盗墓文学”的走红可以说是“类型文学”发展的一个案例。因而，在谈“盗墓文学”之前，我们先来看

一下“类型文学”的概念。

“类型文学”指的是近年来从网络平台流行到图书市场的通俗文学，其实质是将通俗文学作品在文化背景、题材类别上做进一步细分，使之具有模式化的风格，以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要。^①

“类型文学”是在传统“精英文学”和“纯文学”之外更广泛的文学形式，结合现有的作品类型与流行提法，大体可以归为以下门类：1. 官场 / 职场（如《杜拉拉升职记》、《浮沉》）；2. 架空 / 穿越（如皇帝戏）；3. 武侠 / 仙侠（如大量模仿金庸之作）；4. 玄幻 / 科幻（如宇宙文学）；5. 神秘 / 灵异（如《新西游记》）；6. 惊悚 / 悬疑（如侦探文学、盗墓文学）；7. 都市 / 情爱（如打工文学、爱情肥皂剧）；8. 青春成长（如中学生文学）等。^② 可见，盗墓文学作为网络文学的一个分支，只是众多网络类型文学中的一种，但因其市场和学界受到的冰火两重天的待遇，即持续走红的市场销售与学术界尖锐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反差使盗墓文学的发展分外引人注目。

打开中国知网（cnki），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中，通过全文范围内搜索“盗墓文学”，查找到46条结果；在博硕论文库、会议论文库中，同样在全文范围内搜索“盗墓文学”，分别查到41条、2条结果。也就是说，有近90篇文章使用了这一概念。^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论文的作者多以众所周知、不证自明的口吻来谈论这一文学现象，包括肯定或否定其文学价值，但鲜有文章对“盗墓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陶东风教授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80后写作”论文中谈及“盗墓文学”，指出“兴盛于2007年的‘盗墓文学’是‘玄幻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仍然是装神弄鬼，只是在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神奇、更加刺激、更加不可思议、更加显得有‘知识性’。”^④ 该文将“盗墓文学”作为“玄幻文学”的延伸品和附

① 汪树东：〈类型小说的文化发生学考察〉，《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4期，第12页。

② 类型文学的概念参照〈类型文学〉一词条，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56页。

③ 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查询时间为2015年1月28日。

④ 陶东风：〈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38页。

属物，但在详细讨论“玄幻文学”概念的同时，却没有界定“盗墓文学”，只是列举了“盗墓文学”的诸多特征，特别是它综合历险故事、侦探小说、文物展览等流行文学的诸多特质。陶教授对盗墓文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文学价值不高，人文精神稀薄，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表达了对于“80后”玩游戏机长大的一代价值观颠倒、人性冷漠的担忧。该文当时曾引起文坛较大的争论和反响，奠定了学术界对“盗墓文学”批判性审视的基调。

因为“盗墓”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盗墓文学”的兴起引发了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中鬼故事和盗墓故事的梳理，如袁武的《略谈中国的盗墓小说》、张玉莲的《古小说中的盗墓叙事研究》等。于是，有了“盗墓文学”广义、狭义的说法，马善梅在《“盗墓文学”兴起之源探索》一文中提出“广义的盗墓文学应包括古今所有文学作品中有盗墓的部分”。狭义的“盗墓文学”指的是“2006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以《鬼吹灯》、《盗墓笔记》等为代表的以盗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文学。”^①但实际上这种区分没有什么必要，很少有读者会混淆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与当代网络小说，因为二者在叙述方式、内容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更多对“盗墓文学”的定义是基于题材的划分。汤哲声在《论新类型小说和文学消费主义》中将盗墓小说归为新类型小说，借以区别于20世纪初包天笑等“鸳鸯蝴蝶派”老类型小说。汤文将盗墓小说归为惊悚小说，认为它是玄幻小说的延续，只不过将修真世界写到古墓之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天下霸唱的《鬼吹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②吴昊在《盗墓类小说流行现象研究及阅读策略——以北京市第166中学为例》中，认为“盗墓类小说是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并由纸媒正式出版的以盗墓为题材的具有惊悚、怪诞、玄幻风格的小说作品，代表作有《盗墓笔记》、《鬼吹灯》等”。^③吴文的定义较好地概括了盗墓小说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但仅限于小说单一文类，同现实中类型文学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尚有一

① 马善梅：〈“盗墓文学”兴起之源探索〉，《科技信息》，2011年第28期，第153页。

② 汤哲声：〈论新类型小说和文学消费主义〉，《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第41页。

③ 吴昊：〈盗墓类小说流行现象研究及阅读策略——以北京市第166中学为例〉，《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第179页。

定距离。

2012年一篇硕士论文高举“盗墓文学”大旗，宣告了这一类型文学的成立。西北师范大学的朱婉莹2012年在其硕士论文《论新世纪的盗墓文学——以〈鬼吹灯〉为例》中，指出盗墓文学是“没有被学术界严肃的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从现今的发展的态势和它盗墓小说流行的时间和广度上来看，将它直接定义为一种文学和潮流是有必要的。”^① 尽管该文将界定“盗墓文学”的概念视为写作目的之一，试图将“盗墓文学”抬升至与“玄幻文学”并置的地位，并对《鬼吹灯》做了详细的文本解读，但全文仍然没有出现一个明确完整的定义。

其后的研究文章则更为乐观地看待盗墓文学，如《网络小说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激活——以〈鬼吹灯〉为例》、《“想象力”与“神秘感”是文学永远的魅力——以〈鬼吹灯〉和〈藏地密码〉为例，对网络流行小说的另一种解读》等论文，对盗墓文学多持肯定态度。2013年出现了2篇以《盗墓笔记》作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杨震的《国内网络文学发展现状探析——以〈盗墓笔记〉为例》和贺湘锦的《〈盗墓笔记〉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显然，在这些80后、90后作者笔下，对盗墓文学不乏正面评价和溢美之词，与精英阶层认为“书市墓气重”、“文学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等负面评价形成鲜明的反差。

可见，盗墓文学的定义伴随着文坛、学术界对这种类型文学的评价和研究状况而变化。那么，什么是盗墓文学呢？笔者以为“盗墓文学”泛指记述主人公利用风水秘术盗墓探险的离奇经历，通过展现超自然现象以达到刺激、娱乐、游戏目的之通俗文学作品及其文化衍生品。就其发展规模、流行程度而言，“盗墓文学”已成为一种网络类型文学，甚至发展为当代大众文学的一支主力军。目前的盗墓文学已经不局限于网络和实体书行业，在游戏、漫画、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音乐等行业都有所涉及，可以说大大拓宽了以往文学受众的范围。这一改变无论对于读者，还是作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将改变通俗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① 朱婉莹：《论新世纪的盗墓文学——以〈鬼吹灯〉为例》，中国知网博硕论文库，2012年，第2页。

二、“盗墓文学”的流行及其成因

研究大众文学时，我们通常将读者（受众）置放在作者前面，因为完全是市场销售业绩使某一类型文学凸显在大众视野之内，盗墓文学的兴起也不例外。我们以《鬼吹灯》及《盗墓笔记》为例，来说明盗墓文学兴起的原因。

张牧野（网名：天下霸唱）2006年发表的《鬼吹灯》将“盗墓”引入网络文学，作品以奇异的探险故事为核心，搭配以中国传统墓葬文化、文物考古知识、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兄弟间的情谊等要素，加之幽默精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墓穴”世界，开启盗墓文学之先河。随后，网络上相继推出《盗墓笔记》、《盗墓之王》、《墓诀》、《盗墓者》、《盗墓史记》、《茅山后裔》、《西双版纳铜甲尸》等作品。其中，以徐磊（网名：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最为出色。笔者分别统计了《鬼吹灯》和《盗墓笔记》两部小说在网络和图书市场上的阅读、销售情况，选取了起点中文、百度贴吧等国内知名文学网站，统计了网络点击量、发帖数、书评、同人作品^①数量等数据，同时以玄幻小说《诛仙》、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在网上的传播情况进行对比，^②旨在直观地呈现盗墓文学的流行状况。

我们先对图表中选择的网站、网络用语等情况做一些简要说明。“起点”中文网作为目前国内用户数量最多、收藏最全面、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中文原创网站，成为盗墓文学的主要阵地。天下霸唱最初在天涯社区莲蓬鬼话板块连载《鬼吹灯》时，只是哄女朋友的消遣之作，不期受到网友热捧，点击量激增；2006年《鬼吹灯》获“起点”中文网签约，开始作为正式作品连载，并执行VIP会员收费制度。《盗墓笔记》及其他盗墓小说的连载模式与之相似，大部分盗墓小说都在“起点”中文网上首发。由于《鬼吹灯》和《盗墓笔记》在百度贴吧里有多个“吧”，如《盗墓笔记》书迷们自发结成了“盗墓笔记吧”、“瓶邪吧”、“黑花吧”、“反黑

① 同人作品通常指某部作品的爱好者以原著的设定和人物创作出来的网络文学作品，可以是文字、漫画、音乐、视频等多种形式。

② 表格上查询网站为：<http://www.qidian.com>，<http://tieba.baidu.com>。数据查询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17:00-19:00。

		鬼吹灯 I	鬼吹灯 II	盗墓笔记	诛仙	莫言	余华
起点 中文 网	首发 时间	2006.2.20	2007.6.18	2006.7.6	2007.3.20		
	总点 击量	19393555 次	5162112 次	18420420 次	28520984 次		
	荣誉	2009.9.22 获 1000 万点击	2013.2.6 获 500 万点击	2010.12.9 获 1000 万点击	2009.9.22 获 1000 万点击		
	书评	3060 条	1014 条	4316 条	9979 条		
	同人 作品	近 30 部		近 40 部			
百度 贴吧	贴吧 人数 (关注)	元良 / 灯丝 138731		稻米 / 地下 党 625673	幻月痴人 1746605	食草家族 16217	5377
	主题 数	62070 个		477084 个	703117 个	9623 个	2909
	发帖 数	1535165 篇		31214933 篇	71269686 篇	129698 篇	37123 篇

花吧”等，笔者选取了“鬼吹灯吧”和“盗墓笔记吧”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贴吧提取相关数据，以“诛仙吧”、“莫言吧”和“余华吧”作为对比。“鬼吹灯吧”虽因作品结束较早、纸质书的出版等因素，而在点击量上不占优势，但书迷们的讨论仍活跃且痴迷；《盗墓笔记》与《诛仙》两部作品的连载时间相近，但“盗墓笔记吧”无论人数、帖子数、同人作品等方面都领先于“诛仙吧”。而百度贴吧上的莫言吧和余华吧，各方面均无法与网络类型文学相抗衡。网络书迷们一般有特定的称呼，如《鬼吹灯》的书迷自称“灯丝”、“粽子”或“元良”，《盗墓笔记》的书迷自称“稻米”或“地下党”，这些书迷自发聚集于网络贴吧，在里面发表言论、讨论作品等，从书迷发表的帖子中可以窥见他们真实的阅读感受和市场反馈情况，包括对于剧情编排的意见、建议，关于小说细节的讨论、对改编为影视剧动态的追踪等。

通过图表，我们对比一下盗墓文学与精英文学在网络上的阅读情况。本文选取莫言、余华作为当代中国精英文学的代表，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效应和小说《红高粱》被改编为电影的履历，为莫言在国内外积累了超高的人气；余华在国外频频获奖^①和小说《活着》同样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的经历，也让余华

^① 余华 1998 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 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 年获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8 年获得第一届法国

成为口碑极佳的作家。莫言和余华是中国文坛上在学界和市场两方面皆有上乘表现的作家，但在网络上他们受欢迎的程度明显不如刚刚崛起的“80后作家”。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鬼吹灯》和《盗墓笔记》的点击量仅在短短三、四年间突破了1000万，总点击量达到2000万左右，与玄幻小说代表作《诛仙》不相上下，动辄数千人的书评和发帖数也体现出读者反响之大，让精英作家们望尘莫及。

再看一下实体书的销售情况。由于《鬼吹灯》和《盗墓笔记》已经完成网络连载，许多读者会购买全套纸质书作为收藏，这带动了实体书的销量。《鬼吹灯》前四卷于2006年10月上市，首印16万册，加印4次，不到一年时间销量近百万册；《盗墓笔记》2007年开始发行纸质书，前7册累计总销量近1000万，第8册2011年12月19日上市，面世首日即跻身各大网站销售排行榜首位，仅卓越网一天就售出15000多册，第一周的销量即突破百万，首印达到210万，并加印5次，力压郭敬明的《小时代》、韩寒的《青春》。在图书市场整体走下坡路的今天，一些知名作家作品的销量每年尚不足五千本，盗墓文学动辄千百万本的销量堪称奇迹。

盗墓文学的市场反响和销售情况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充分的市场化现状，可以说是庞大的读者群催生了这一类型文学。盗墓文学的读者群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公司白领、爱好考古冒险的中青年，还有一些海外留学生、港台人士、外籍华人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盗墓文学能吸引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的读者，是由于符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迎合了大众的普遍心理诉求，主要包括：

第一，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陌生化、神秘化是盗墓文学重要的特点，读者初接触盗墓文学，往往被其中的龙楼宝殿、奇异生物所吸引，它为读者呈现出远离日常平淡生活的离奇冒险。《鬼吹灯》讲述了主人公胡八一依靠一部家传的风水残卷盗墓寻宝的历险故事。《盗墓笔记》也通过一部五十年前从古墓中盗出的战国帛书，讲述了古董店小老板吴邪追溯祖先盗墓传奇的历险故事。一个平庸、一事无成的小人物，一旦遁入地下的墓穴，便成为神通广大、睿智机敏的“英雄”，这不能不让当代青年遁入“白日梦”的

幻觉之中。

第二，迎合大众的寻宝愿望。一夜暴富是大多数人的梦想，盗墓文学中的摸金校尉^①恰恰能实现这一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鬼吹灯》中的胡八一和胖子倒斗（盗墓）前是倒卖盒带濒临破产的老知青，倒斗后不仅自身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还有能力帮助牺牲战友的家人。盗墓小说满足了人们对金钱的窥探和占有欲，盗墓的不正当性更能使人产生做坏事的刺激感。

第三，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盗墓小说在网上连载，必须以情节取胜，故其故事发展迅速、跌宕起伏，方便读者随时阅读，在寻求感官刺激的同时能够获得阅读快感，可谓典型的“快餐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盗墓文学的读者群有着明显的年龄段特征，绝大部分属 80、90 后群体。当这些青年不约而同地选择阅读盗墓文学时，反映了其共同的心理需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学校、医院、军营、工厂等机构也逐渐演变成规训的场所，利用“全景敞视”的建筑理念设计教室、病房和工场，采用层级的监督管理机制^②，学校中青年的个体差异被抹杀，学习过程成为接受规训的过程；进入社会后，更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只能以社会期待的样子示人，个性进一步地被压抑。现代性带来的对人的异化，使青年试图逃避现实，抗拒当下，甚至产生自我否定、自我厌恶等“现代病症”的不良情绪。在这样的生活境遇中，小说作为大众共享的“白日梦”，各种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和认可的欲望在小说中得以释放，而且在现实中受压抑越深，“白日梦”对现实生活的反抗便越强烈。因此，盗墓小说这种与现实差距较大的作品一时间成为年青一代集体的“白日梦”，那些期待指点山河、运筹帷幄但现实中一事无成的青年，会在穿越时空的墓穴探险中找到心理慰藉，在阅读、讨论盗墓小说的过程中产生际的共鸣。加之网络论坛的隐匿性特点，人们隐藏于各自的 IP 地址后发声，宛若戴上面具后的交谈，能够更加无所顾忌、酣畅淋漓

① 据记载，为筹备军饷，三国时期的曹操设立“摸金校尉”一职，专司盗墓。曹军曾挖开了芒砀山王墓，即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参看关山远：〈古今盗墓谈〉，《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9月2日第14版。

②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96-200页。

地自由发声。以上分析的盗墓文学在网络上持续火爆的种种原因，概括起来就是盗墓文学的兴起是由读者即市场所造就的。

三、“盗墓文学”的发展瓶颈

盗墓文学虽然在市场上无限风光，但在表面繁荣背后却潜藏着种种危机。盗墓文学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局限，虽然在读者的追捧中得以繁荣一时，但很快就进入一个瓶颈期，如果无法克服这些制约其发展的因素，盗墓文学将无法继续发展。

在起点中文网上搜索“盗墓”，查到相关小说共 2175 部。其中，2006 年 49 部，2007 年 156 部，2008 年 154 部，2009 年 289 部，2010 年 357 部，2011 年 400 部，2012 年 476 部，2013 年 274 部……可见盗墓小说的热度未减，但仔细分析数据背后却发现其中隐藏的危机。盗墓文学中公认的好作品，如《鬼吹灯》、《盗墓笔记》、《茅山后裔》、《天眼》、《盗墓之王》、《摸金令》、《西双版纳铜甲尸》等均创作于 2006-2008 年，之后再没有知名作品问世。虽然盗墓小说的总量继续增长，但质量却没有上升，多为续作或模仿之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盗墓文学在兴起的同时，又迅速走向“衰落”。由此可见，盗墓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究其原因，主要与该题材备受争议的伦理取向有关，同时也与作者想象力的贫乏、读者的审美疲劳等因素相关。

1、备受争议的伦理取向，这是制约盗墓文学发展最主要的阻力。“盗墓”本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尽管盗墓小说以三国时期曹操设立的“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等官职作为盗墓贼的代称，也记述了“人点烛，鬼吹灯，鸡鸣灯灭不摸金”等盗墓行规，但无法改变盗墓有悖伦理道德的不正当性。盗墓文学自兴起之日，便饱受“不道德”的指责。有学者指出盗墓与考古完全不同，对考古工作造成巨大危害；更有媒体抨击盗墓文学误导年轻人，充当了“盗墓教科书”的角色。^① 针对这些批评，尽管有作者喊冤，声称盗墓

^① 参看陈熙涵：〈《鬼吹灯》竟成“盗墓教科书”〉，《文汇报》2009 年 2 月 26 日第 9 版。李红笛：〈盗墓：文学之热与现实之殇〉，《检察日报》2014 年 10 月 10 日第 5 版。

小说完全是虚构的，但事实上对于思想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确有误导的可能。为此，《盗墓笔记》在向广电总局申请拍摄同名电影时，基于上述考虑，作者、导演、编剧等对剧情做了很大改动，将盗墓改为考古之后，才通过审批。这反映出盗墓文学面对大众道德审判时尴尬的境遇。当作品流传达到一定程度，舆论中的道德评判开始显露出来，作者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动机和情节的合法性，要自觉承担起相关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使文学的发展进入良性的轨道。

2、作者想象力的贫乏，造成盗墓文学拼凑痕迹严重、情节模式化的弊病。盗墓文学主要靠作者利用想象力进行创作，网络上的写手多是兴致所至，随手开写，但创作力不济时就搁置起来，后来便完全放弃了。这导致盗墓小说中产生大量残篇断篇，影响其后续发展。许多盗墓文学作品还存在着拼凑情节、人物设置趋同等问题。例如，《鬼吹灯》和《盗墓笔记》的人物设置基本相同，都是“男主角 + 胖子 + 军师”的三人组合，套用了西方探险小说的人物设置，情节围绕着借助风水秘术寻找深山海底的龙楼宝殿。其他盗墓类小说也万变不离其宗，即使是号称“反盗墓小说”的《我在新郑当守陵人》，其主要内容也是阴阳风水、冥器古董等。

造成情节模式化的另一重原因在于网络写作的开放性——作者与读者及时而频繁的交流所致。网络写作虽然实现了传统文学梦寐以求的作者与读者的及时互动，但同时削弱了作者的独立性，造成其创作极易受到读者干涉和影响的结果。表现为作者常根据网友的反馈（跟贴）进行调整，如果调整得好还行，但不少作品最后变成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其深层原因还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对市场的迎合。读者的阅读选择往往来自点击率和以往读者的评价，出版公司、动漫公司也通常选择各大网站上点击率最高的几部作品签约、出版或改编。一些作者因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为争取更多点击量而刻意地讨好读者，甚至违背创作初衷，不断添加制造噱头的新元素，但过于杂乱的拼凑和嫁接将大大削弱其艺术效果。此外，盗墓文学的作者多半是未接受过专业文学教育的社会人士，如果作者的艺术修养得不到进一步提高，势必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3、盗墓文学的模式化发展容易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其结果便是这一类型文学在繁荣的同时也将迅速走向衰落。由于《鬼吹灯》及《盗墓笔记》的模式成为盗墓文学的样板。叙述模式和情节

的雷同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对盗墓小说失去了新鲜感，从而丧失了后续发展的动力。本来盗墓文学依靠离奇的情节和历史地理知识大杂烩，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和窥私欲，来赢得市场。而今读者新鲜感的消失代表着市场需求的萎缩，在中国文学出版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市场是决定某一类型文学生命的关键因素。读者阅读口味的变化是出版界、动漫产业、文学市场的指示灯，但一味地迎合并非上策，不少网络文学因为作品缺乏内涵，对人生哲理思考不足所以只能停留在大众消遣读物的层次。如何在吸引读者的同时，提高读者的审美能力和个人修养，是当代网络写手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盗墓文学在内容特色、生产传播机制、读者接受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问题，使其发展后继乏力。由此看来，作为大众通俗文学的盗墓小说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除了需要在内容上多做创新，还要使出版过程更为规范，与读者的互动更加理性。

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因其快捷性、大众性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盗墓文学满足了青年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欲望，其火爆便不足为奇。正如快餐食品挤占了我们的冰箱，盗墓文学之类的快餐文学也正侵蚀着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胃部和头脑正在承受着比以往更多的味觉和视觉体验，但值得警惕的是，在注意到当代文坛热潮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热潮”背后的危机和问题。在盗墓文学求新、求奇的表层下，其实质仍然是寻求感官刺激，反映了当代文坛苍白、肤浅的创作风气，一味地朝着“反经典”、“重口味”方向发展。创新和转型是通俗文学发展要经历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当代英美文学畅销书中不乏备受学者青睐的作品，我们期待能够同时被市场和学术接纳的好作品。身为学界精英的研究者不必因为作品的通俗畅销而一味地批评、打压，避免造成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而应引导作者更好地进行写作；另一方面，作者应该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尽快从天马行空地脱缰写作尽快转型到有意识、有意识地创作，自觉承担起传播传统文化、引导青年人的责任，以此完成写作身份的转变。因为对于作者来说，有思想性和生命力的作品应该比短期的畅销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陈熙涵：〈《鬼吹灯》竟成“盗墓教科书”〉，《文汇报》2009年2月26日第9版。
2. 关山远：〈古今盗墓谈〉，《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9月2日第14版。
3. 李红笛：〈盗墓：文学之热与现实之殇〉，《检察日报》2014年10月10日第5版。
4. 马善梅：〈“盗墓文学”兴起之源探索〉，《科技信息》2011年第28期。
5.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6. 陶东风：〈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7. 汤哲声：〈论新类型小说和文学消费主义〉，《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
8. 吴昊：〈盗墓类小说流行现象研究及阅读策略——以北京市第166中学为例〉，《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9. 汪树东：〈类型小说的文化发生学考察〉，《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4期。
10. 朱婉莹：《论新世纪的盗墓文学——以〈鬼吹灯〉为例》，中国知网博硕论文库，2012年。



撒拉话能维持吗? ——青海循化县撒拉话使用研究

潘碧丝

内容摘要: 撒拉族^① 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强烈的语言认同, 使循化县的撒拉话能得到良好的维持。在汉语教育和普通话的普及, 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 撒拉族面临语言选择和语言取向的抉择, 撒拉语因而面临极大挑战。

关键词: 循化县; 撒拉话; 维持

作者简介: 潘碧丝,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研究兴趣: 应用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和马华文学。邮箱: fanpikshy@um.edu.my

Title: Can Salar Language Maintain? – A Research on the Use of Salar Language in Xunhua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Abstract: The Salar is one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living mainly in the Xunhua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Due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trong affirmation of its language, the Salar language is well preserved in Xunhua County. However, under the impact of Mandarin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Salar faced with language selection and language orientation choices. Salar language therefore face great challenges.

① 在进行田调期间, 大部分所接触的撒拉族表示他们更愿意被称为族人间通用的“撒拉尔族”。本文为避免产生混淆, 仍用中国政府与学界的“撒拉族”命名, 特此说明。

Keyword: Xunhua County; Salar language; maintain

Author: Fan Pik Shy, Senior Lecturer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applied linguistics, China minority ethnics,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fanpikshy@um.edu.my>

一、前言

撒拉族是中国 56 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较少的 22 个民族之一，常有外族戏称其为少数民族中的“国宝熊猫”。撒拉族主要聚居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化隆回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其余的则散居在青海省的西宁市、黄南、海北、海西、海南等州、甘肃省夏河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县等地。根据 2010 年青海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撒拉族有 10.70 万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 264.32 万人中的 1.90%，而循化县是撒拉族的主要聚居地，这里全县 3 镇 6 乡 154 个行政村，总人口 12.69 万人，其中撒拉族就有 7.8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2%，占全中国撒拉族总人口的 80.5%。^①

撒拉族是什么民族？从何处来、何时到循化县？这几个问题至今仍是撒拉族学者们探究的问题。综合研究成果，不外有两种情况，一是根据富有浪漫色彩的民间神话传说；二是经过史料考证的结论。早期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都认同《循化志》^②、《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③、《撒拉族简史》^④ 中的说法，或者根据民间故

① 循化县人民政府：<http://www.xunhua.gov.cn>。创建时间：2011 年 8 月 5 日。

② 《循化志》由龚景瀚编撰，全书 8 卷，28 个子目，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依据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清嘉庆刻本，在 1981 年翻印出版。

③ 《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由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 1963 年出版。

④ 《撒拉族简史》是中国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的其中一本。此书介绍了撒拉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记录了撒拉族从起源至 21 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事“骆驼戏”、“骆驼泉故事”^①提供的线索,认为撒拉族是从中亚的撒马尔罕^②迁来循化的。^③韩中义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撒拉族先民是撒罗尔人,是突厥蛮的一支,是从阿富汗北部的萨曼甘(Samagan)迁徙而来的。人们是因为萨曼甘跟撒马尔罕的读音相近而造成了长期以来的错误。^④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以及国际学者之间,尤其是与中亚国家学者的交流,使撒拉族族源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其中,马成俊在土库曼斯进行访问与该地学者交流,同时又通过与米那瓦尔的发现进行比较后,认为撒拉族先民是从土库曼斯坦西部马雷州一个名叫“Sarahas”的地区往东迁徙,他们途经在13世纪时作为整个中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撒马尔罕,但撒拉人对马雷这个小小的城镇失去了记忆,反之却记住了撒马尔罕这个在传说中保留下来的地名。^⑤目前,学界觉得这个说法可信度更高,更多学者倾向认可这个结论。

对于撒拉族的迁徙年代,综合了各种史料和文献,基本上学者

方方面面的内容。此书由民族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 ① 骆驼泉位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西4公里的街子村清真大寺附近,是传说中撒拉族的祥地。据传,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一个小部落里有两兄弟朮勒莽和阿合莽,因在当地威望很高,而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忌恨和迫害,于是率领同族18人,牵了一头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手抄《古兰经》离开撒马尔罕向东寻找新的乐土。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来到了青海省的循化县。这时天色已黑,苍茫中走失了白骆驼。第二天,他们在街子东面的沙子坡下发现一眼清泉,走失的骆驼卧在水中,已化为白石。他们测试了当地的水土,发觉与故乡的水土相同,认定这里就是他们寻找的乐土,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后将这个清泉起名为“骆驼泉”。
- ② 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连接着波斯帝国、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现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罕州的首府。
- ③ 参阅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96-106页。
- ④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46-150页;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96-106页。
- ⑤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46-150页;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96-106页。

都认为是元代或者 13 世纪时期迁徙到中国循化县的。^① 杜安霓和片冈一忠则认为迁徙的年代要晚至 14 世纪。至于迁徙的次数，有的学者认为有两次大迁徙，持这种看法的是宋蜀华、王良志和米娜瓦尔。宋蜀华、王良志认为第一次发生在元朝中叶时期，第二次则是在 1371 年。^② 米娜瓦尔则认为首批撒鲁尔人在 13 世纪前半叶来到循化，而第二批撒鲁尔人为了躲避战乱在 14 世纪后半叶逃到了循化。^③ 韩中义也认为撒拉族先民是分批东迁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 1221 年成吉思汗征服呼罗珊地区后，而第二次大规模东迁发生在 14、15 世纪左右，当时的撒拉族先民是为了逃避黑羊王朝与白羊王朝^④ 长期斗争所引起的乱争，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区举族东迁至循化。^⑤

撒拉族在中国居住已经七百多年历史，从几百户人家的部落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体。虽然学者对撒拉族的族源探索不断，但撒拉族作为中国 56 个民族中的成员之一却早已经确定下来了。1953 年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撒拉族在中国民族中的地位，从原来的“撒拉番回”、“撒拉回”、“循回”正名为撒拉族。^⑥

① 顾颉刚认为是 1279 年；宋蜀华和王良志，朱刚主张是元代从撒马尔罕来；非一之和马成俊都认为是在 13 世纪。

② 宋蜀华、王良志：〈关于撒拉族历史来源的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 6 辑）》，1959 年。引自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第 146-150 页。

③ 米娜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第 16-19 页。

④ 白羊王朝是土库曼人在波斯建立的王朝（1378-1508），因以白羊旗帜为标记而命名为白羊王朝。黑羊王朝则是土库曼人在现今伊朗西北部建立的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的王朝（大约 1375~1468）。因以黑羊为旗帜标记，所以叫黑羊王朝。白羊王朝跟黑羊王朝长期对峙，15 世纪后期黑羊王朝被白羊王朝所灭。

⑤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第 146-150 页。

⑥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第 146-150 页。

二、研究背景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是撒拉族主要的聚居地，撒拉族先民到循化定居时只有 170 户，经过了七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撒拉族已经有十几万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撒拉人从循化迁出，但全中国 80.5% 的撒拉族还是聚居在循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人数不多的撒拉族并没有受到他族的同化影响，本民族的文化依然保存良好。就语言而言，长期与藏族人和汉族人的接触，大部分撒拉人没有放弃本民族语言，反而借用了不少藏语和汉语词汇，使得撒拉语更具特色。

撒拉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的乌古斯语组，跟土库曼、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等语言同属于黏着语类型，撒拉族本民族语言曾经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却已经失传。^① 因此汉语成为了撒拉族书面交际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越频繁和密切，撒拉族不得不掌握汉语，以汉语跟其他民族进行沟通交流，这使得能够掌握双语的撒拉族越来越多。没有文字，又在强势语言汉语的竞争下，撒拉语能够不断地发展传承，必有其原因。此次对循化县撒拉族进行田野调查，除了研究撒拉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更重要的是探讨撒拉族语言的保持情况，所得结论对其他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持必有借鉴作用。此外，我们也发现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多数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② 以三个年龄层为调查对象的

① 撒拉族曾经使用过一种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字母为基础拼写的“土尔克文”的文字。19 世纪时这种文字不仅用于宗教方面注释和解说经典，也成为社会通信、书写契约、记事立传、著书立说的应用文字。后来因为撒拉族的发展长期受周围汉藏民族的影响和渗透，加上这套文字体系学习起来较为困难，因此未能在群众中广泛普及流传。韩建业：〈从文献资料看撒拉语的发展变化〉，载马成俊、马伟主编：《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04 页。

② 张素杰、李新华：〈云南省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语言及态度探析〉，《今日南国》，2008 年第 6 期，第 208-210 页；张素杰：〈云南省哈尼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探析〉，《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105-107 页；孙咏梅、孙咏莉：〈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怀化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17-21 页；刘洪宇、杨晖：〈青海省撒拉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分析〉，《青海师

研究目前不多，而且就循化县而言，还欠缺相关调查，所以我们认为此调查研究有其科研价值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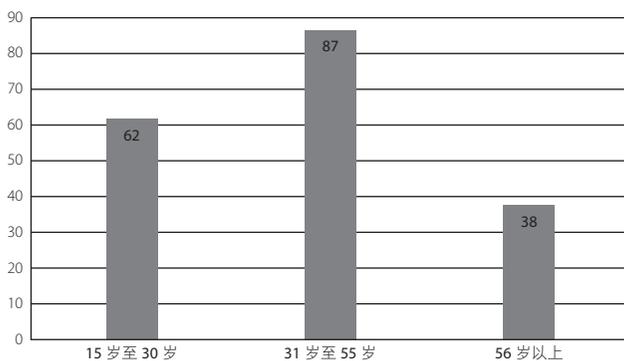
我们在 2013 年 8 月份在循化进行了短期的采访和观察。^① 调研的方式为分发问卷与口述历史访谈。分发问卷所进行的地区依次为清水乡、街子、积石镇、白庄乡和查汗都斯，部分问卷亦为西宁市撒拉族填写。本次调查共有 187 个调查对象，男性 121 人，女性 66 人，分别占 65% 和 35%。我们将对象分成三个年龄段，15-30 岁年龄段，共 62 人，占 33.16%；31-55 岁年龄段，共 87 人，占 46.52%，以及 56 岁以上年龄段，共 38 人，占 20.32%。

从教育程度来看，以小学程度教育水平的比例最高，共 53 人，占 28.34%；没有受教育的共 39 人，占总人数的 20.86%；至于有初高中和大学教育程度的调查对象比率相差不远，分别是 37 人、32 人和 25 人，各占 19.79%、17.11% 和 13.37%。

在职业分布方面，农民是最大的群体，共 56 人，占 29.95%，其次为学生共 45 人，占 24.06%；商人 21 人，占 11.23%；服务业者共 16 人，占 8.56%；教师 9 人，占 4.81%；公务员和工人各 6 人，各占 3.21%；退休者和其他职业者分别是 3 人和 26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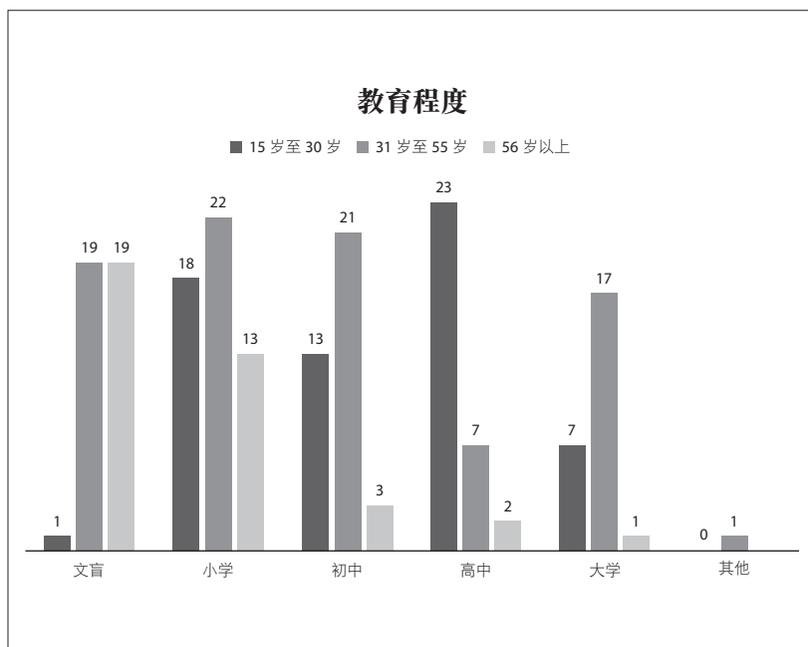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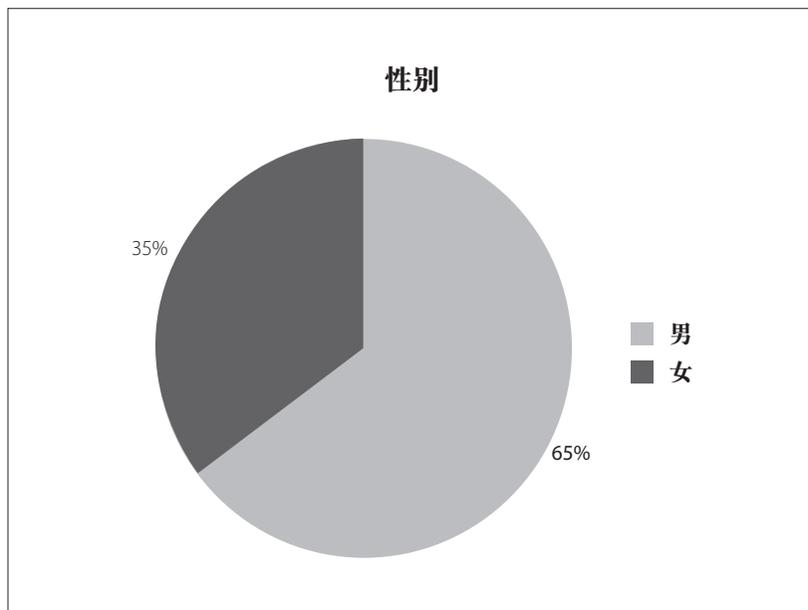
表 1: 调查对象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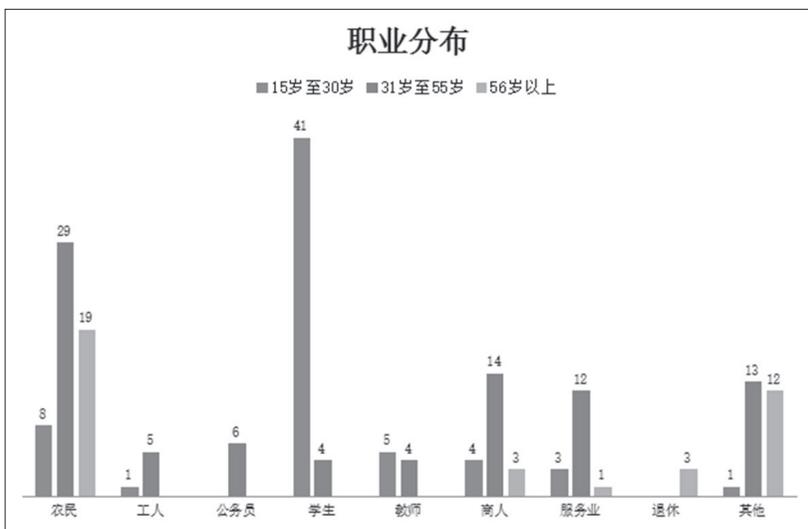
调查对象人数



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第 103-107 页；才果：〈对青海藏族师范生教学语言兴趣的测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72-78 页。

① 此为马来西亚教育部“高绩效研究基金”子项目之一。项目编号：UM.C/625/1/HIR/MOHE/ASH/03。





三、撒拉族的语言使用情况

撒拉族长期与藏族、汉族和回族生活和相处，所以撒拉语、藏语、普通话和循化话（青海方言）是这里普遍的交际语言。循化县周围以藏族人为多，所以早期撒拉族跟藏族的交往比较频繁，习得藏语在年长的撒拉族群中是非常普遍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的发达，走出循化县的撒拉族越来越多，而前来循化县经商或者旅游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也逐渐增加，再加上汉语教育的普及，藏语的习得已经不比普通话重要，年轻的一辈不会藏语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普通话的重要地位会不会影响了年轻撒拉人的语言习得呢？年长的一辈会不会为了让年轻的一辈更好地掌握汉语普通话而放弃撒拉语呢？

首先，我们看撒拉族的家庭用语。撒拉族的家庭大多遵循早婚的传统，三代同堂的情况普遍。我们的问卷将对象分为长辈、同辈、子辈和孙辈。我们发觉每一代或者三代之间在家里使用的语言都是以撒拉语为主（表2），而在同辈、子辈和孙辈之间使用普通话的百分比则有逐渐增高的趋势。随着汉语教学的普及，撒拉语在年轻一代中就不再是唯一的交际语。我们也针对入学前和入学后的家庭使用语言做调查，15-30岁组别的数据显示，62个调查对象入学前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以撒拉语占最高的百分比，依次为普通话

和循化话。接受教育以后,在家庭沟通语言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撒拉尔话依然是主要的沟通语(表3)。可见,尽管普通话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许多城市的小孩已经不会说方言或者母语的当儿,循化县的撒拉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语,从小习得撒拉语,在家里跟家里的成员用撒拉语沟通。因此,家庭语言对于民族语或者母语的保持是关键之一。数据一方面显示了撒拉语在撒拉族的地位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撒拉语跟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样,有逐渐被年轻人放弃使用的趋势。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跟丁石庆和郭菲菲,以及刘洪宇和杨晖的研究结果相同。^①

表 2: 家庭语言使用情况

说话对象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²¹	其他
祖父母 (161)	4.97	91.93	3.10	0.00
父亲 (175)	8.57	88.57	2.86	0.00
母亲 (175)	6.86	90.28	2.86	0.00
外祖父母 (138)	5.07	92.03	2.17	0.73
配偶父母 (112)	11.61	83.93	3.57	0.89
哥哥 / 姐姐 (187)	13.90	79.68	6.42	0.00
弟弟 / 妹妹 (187)	12.83	80.75	6.42	0.00
配偶 (135)	9.63	82.22	7.41	0.74
孩子 (141)	14.89	77.30	7.80	0.00
媳妇 / 女婿 (120)	12.50	82.50	5.00	0.00
内孙 (90)	18.89	76.67	4.44	0.00
外孙 (87)	18.39	77.01	4.60	0.00

* 对象组群依次为长辈、同辈、子辈和孙辈^②

① 丁石庆、郭菲菲:〈谈撒拉族聚居村落的语言文化——以青海省循化县积石镇石头坡村为例〉,《撒拉族专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74-80页;洪宇、杨晖:〈对青海省撒拉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03-107页。

② 指的是青海方言。

表 3: 15-30 岁组入学前后所使用的语言

说话对象	入学前			说话对象	入学后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祖父 (58)	1.72	96.56	1.72	祖父 (58)	5.17	93.10	1.72
祖母 (59)	1.69	96.62	1.69	祖母 (59)	5.08	93.22	1.70
父亲 (62)	6.45	91.94	1.61	父亲 (62)	9.68	88.71	1.61
母亲 (62)	3.23	95.16	1.61	母亲 (62)	8.06	88.71	3.23
兄姐 (62)	16.13	77.42	6.45	兄姐 (62)	25.80	70.97	3.23
弟妹 (62)	16.13	80.64	3.23	弟妹 (62)	19.35	77.42	3.23

撒拉族在不同场合中使用的语言就有一些变化。我们列出十个一般人经常出现的交际场合，要求调查对象选择他们在这些场合最常用的交际语言。调查数据显示，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中，普通话比较占优势，比如学校、医院、政府部门，而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如聊天见面、菜市场、节日庆典等，撒拉话则是他们的首选（表 4）。不过，如果以年龄层来看，年轻的一代在某些非正式场合里，用普通话的比率高。我们的数据显示，15-30 岁这群对象，在菜市场用普通话的占 45.16%，而用撒拉话只占 24.19。在节日庆典这一项也呈现同样的现象，用普通话的占 53.23%，用撒拉话的占 38.71%（表 5）。至于在清真寺进行礼拜时，数据显示绝大部分的撒拉族使用撒拉话，占 83.96%。

表 4: 交际场合使用语

场合 / 人数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循化话
见面聊天 (187)	20.32	69.52	9.63	0.53
菜市场 (187)	27.27	43.85	28.34	0.53
学校 (153)	72.55	15.03	11.76	0.65
医院 (187)	58.29	20.32	20.86	0.53
政府部门 (187)	63.64	18.18	17.65	0.53
县城商场 (187)	56.15	23.53	19.79	0.53
节日庆典 (187)	34.76	50.26	14.44	0.53
清真寺 (187)	6.42	83.96	9.09	0.53

表 5: 不同年龄层的交际场合使用语

年龄层 (人数)	菜市场				节日庆典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其他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其他
15-30(62)	45.16	24.19	30.65	0	53.23	38.71	8.06	0
31-55(87)	16.09	54.02	28.74	1.15	34.48	48.28	16.09	1.15
56 以上 (38)	23.68	52.63	23.68	0	5.26	73.68	21.05	0

在交际对象跟交际话题的语言方面, 数据显示只要交际对象是本民族, 不论是日常生活的聊天还是讨论国家大事, 撒拉族都会使用撒拉话作为主要交际语; 而交际对象是非本民族时, 撒拉族则会选择使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表 6)。不过, 在跟藏族朋友聊天时, 也有部分撒拉族会使用藏语, 尤其是在年纪比较大的撒拉族群中。这也说明了年轻一代已经不太学习藏语, 藏语已经不再是撒拉族和藏族之间的主要交际工具, 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另一方面, 数据也显示循化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点的功能和作用。在跟汉族和藏族邻居聊天时, 分别约有 27.27% 和 28.24% 的撒拉族是选择使用循化话的。

表 6: 交际对象和交际话题使用语

对象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藏语	其他
跟本民族邻居聊天 (187)	3.21	90.37	5.88	0	0.54
跟汉族邻居聊天 (187)	68.98	2.67	27.27	0	1.08
跟藏族邻居聊天 (170)	51.76	2.35	28.24	14.71	2.94
跟本民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87)	37.43	51.87	10.16	0	0.54
跟汉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71)	73.68	3.51	21.64	0	1.17
跟其他民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78)	69.66	5.62	19.10	2.81	2.81
跟本民族朋友谈 国家大事 (184)	20.65	71.74	7.07	0	0.54
跟汉族朋友谈国家大事 (185)	72.98	2.16	22.70	0	2.16
跟其他民族朋友谈 国家大事 (179)	70.95	4.47	22.34	1.12	1.12
跟陌生人交谈 (187)	69.98	16.58	12.84	1.07	0.53

对双语社群来说，思考与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就这问题询问了调查对象，得出的数据显示思考语言和交际语言基本是相同的，只要跟个人有关或者不涉及其他民族参与的事，撒拉族都会用撒拉语来思考（表7）。不过，在15-30岁年龄段的情况却有点不一样。我们的数据显示这一年龄层的对象在思考跟工作和学习有关，以及国家大事时，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比使用撒拉话高（表8）。这一点再次说明了普通话在年轻一代里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表 7: 思考语言

指标 / 语言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思考跟家庭有关的事 (187)	12.83	80.75	6.42
思考跟工作 / 学习有关的事 (167)	36.53	53.29	10.18
思考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事 (187)	15.51	76.47	8.02
国家大事 (173)	40.46	52.02	7.52

表 8: 15-30 岁年龄层的思考语言

指标 / 语言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思考跟家庭有关的事 (62)	22.58	70.97	6.45
思考跟工作 / 学习有关的事 (62)	53.23	35.48	11.29
思考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事 (62)	27.42	61.29	11.29
国家大事 (62)	64.52	27.42	8.06

在语言和文字的掌握能力方面，受访者对于普通话、撒拉语、循化话的听和说的掌握能力基本没有问题，唯有13个和1个来自56岁以上年龄层和31-50岁年龄层的受访者完全不会普通话，占8.56%。有3人，即1.60%能完全掌握藏语的听说能力。在普通话（汉语）的读和写方面，有43人或22.99%完全不会读，51人或27.27%完全不会写（表9），而且主要还是集中在56岁以上的年龄层。撒拉话没有书写文字，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知晓撒拉语曾有文字，不过也有一部分受访者表示知道撒拉文字曾经存在，因为没有广泛流传，所以本身并不会使用。

表 9: 语言和文字掌握能力

指标 / 语言		普通话	撒拉尔话	循化话	藏语
听	完全听得懂	67.91	90.37	40.64	1.60
	能听懂简单的日常用语	23.53	6.42	56.15	13.37
	完全听不懂	8.56	3.21	3.21	85.03
说	能熟练交谈, 没有障碍	55.61	90.37	38.50	1.07
	基本能交谈, 但有时有障碍	35.83	6.42	57.76	10.69
	完全不会说	8.56	3.21	3.74	88.24
读	能阅读图书报刊	53.48			0.00
	能看懂一般常用文字	23.53			7.49
	完全看不懂	22.99			92.51
写	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	43.85			
	能写一般书信、文件或公文	28.88			
	完全不会写	27.27			

语言和文字是支撑民族文化的根柱。撒拉族总人口仅有十多万 人, 在与各族的交往中, 其语言和文化均受不同程度的影响。如现今许多年轻的一辈, 在日常交谈中参杂大量普通话词汇, 与年老一 辈相比, 语言的纯净度也就大打折扣了。我们可以看出, 在使用范 围有限、没有文字作为载体和普通话教育的影响下, 撒拉话的生存 环境备受考验。为此, 我们向调查对象提出对语言和文字态度作出 判断, 以及对语言前景和期望作出预测。综合而言, 有 58.29% 的调查对象非常同意撒拉话很有用, 32.09% 的人同意撒拉话很有 用。但是, 在认为撒拉话很有用的同时, 受访者也认为撒拉话的 使用范围很有限, 分别有 43.86% 和 40.64% 的调查对象持非常同 意和同意态度(表 10)。对于撒拉话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表示非 常同意和同意撒拉话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调查对象分别占 31.55% 和 27.81%, 而非常同意和同意撒拉话不会消失的有 42.72% 和 34.76% (表 11)。在询问调查对象这道题时, 有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 意。56 岁以上的受访者多数认为撒拉话将会在数十年内消失, 年 轻的一辈则持相反意见, 认为撒拉尔话永不会消失。

表 10: 语言态度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撒拉话很有用	58.29	32.09	5.35	3.74	0.53
撒拉话的使用范围有限	43.86	40.64	8.02	4.81	2.67

表 11: 语言的前景和展望

将来	非常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撒拉话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1.55	27.81	11.23	25.13	4.28
撒拉话不会消失	42.78	34.76	6.95	12.30	3.21

四、调查结果分析

从此次调查访问所获得的资料中，我们得出下列几点：

首先，家庭是民族语言得以维持的基础。虽然撒拉族越来越重视汉语，但也不表示他们完全放弃民族语言的学习。循化县的撒拉族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存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自小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只要与本民族有关的，不论是社会交际、节日庆典、还是思考问题，撒拉族离不开本民族语言。绝大部分的撒拉族都能掌握撒拉话是因为自小习得了撒拉话，并自小与家庭成员用撒拉话沟通。尽管入学后学会了普通话，但这并不影响撒拉族小孩的家庭用语，撒拉话依旧成为他们的主要沟通语。这也是在其他地方的撒拉族不再使用撒拉话的当儿，循化县的撒拉话还能保持良好的原因。若小孩小时候不在家里习得本民族语言，基本上他们长大后不太可能会去学习本民族语言，尤其是不住在本民族聚集区的小孩。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就亲耳听到一位研究撒拉话的撒拉族专家使用普通话跟孩子沟通，因为其孩子从小习得普通话，在家不以撒拉话作为家庭沟通语。撒拉话没有文字，只能通过口耳，一代代传承下去，若不在小时候习得，并在家里使用，进入学校后就很难再有机会学习、接触以及运用。因此，要民族语言得以继续生存传承下去，先决条件就是在本民族家庭里使用，只有这样，本民族语言才可以得到最基本的保护和维持。

其二、社会变迁改变民族语言的功能和价值。循化县位于青海省东部，深居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过去撒拉族与各族有密切的来往，尤其与藏族的关系密切，所以很多年长一辈的撒拉族，能够习得藏语。随着汉语教学的推广以及普通话的普及，能够掌握和使用汉语的撒拉族已经越来越多。近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更加明显，资讯的发达，交通的改善，走出山外的撒拉族越来越多，撒拉族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使得他们不能不掌握汉语。撒拉族也深知要走入主流社会，并有立足之地，非得掌握汉语不可。社会变迁使得民族语言失去了一些交际功能和经济价值，而从优势语言逐渐地变成弱勢语言。

其三、多语冲击使民族语言陷危机。撒拉族热爱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毋庸置疑，撒拉话在撒拉族心中的地位也是无可替代的。撒拉话是他们族内的交际语，也是他们民族情结、民族认同的象征。虽然他们也知道撒拉话的使用范围有限，只能在撒拉族群中使用，但对撒拉话的前景却表示乐观，认为撒拉话不会消失灭亡，尤其是受访的年轻一代。撒拉话没有文字，尽管曾经出台几个方案，但都无法真正落实。即使有了文字，年轻的一代是否会把撒拉语作为优选呢？要走入主流社会，汉语是必须掌握好的；要跟国际接轨，面向世界，英语更是少不了；伊斯兰教是撒拉族的宗教信仰，阿拉伯语又是必修的，在如此多语言的冲击下，年轻一代的撒拉族如何作抉择？如何同时掌握好几种语言呢？因此，撒拉话面临危机是必然的趋势。

五、结语

七百多年前撒拉族移民至中国，大部分的撒拉人聚居在循化县，相较其他地方，撒拉话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维持和传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宪法和语言政策的出台也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对撒拉话的保护起了一定的效果。不过，经济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汉语的价值和需求；而国际化、全球化的快速进程，也使得撒拉族不得不学习英语，这些发展趋势改变和左右了撒拉族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取向。社会变迁使得汉语和英语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越来越强，相对的，撒拉话的交际功能和使用空间逐渐缩小。这也意味着撒拉话的维持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政府和人民

的努力能否战胜时代的冲击是所有热爱撒拉话的人需要深思和关注的。

参考文献

1. 才果：〈对青海藏族师范生教学语言兴趣的测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
2. 丁石庆和郭菲菲：〈谈撒拉族聚居村落的语言文化——以青海省循化县积石镇石头坡村为例〉，《撒拉族专题研究》，2014年第2期。
3. 韩建业：〈从文献资料看撒拉语的发展变化〉，载马成俊、马伟主编：《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刘洪宇和杨晖：〈青海省撒拉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5. 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6. 米娜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7. 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8. 孙咏梅和孙咏莉：〈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9. 张素杰和李新华：〈云南省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语言及态度探析〉，《今日南国》，2008年第6期。
10. 张素杰：〈云南省哈尼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探析〉，《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介绍 ——东南亚诸国 (1949-1965) *

吴尔蓓密、沈志华

内容摘要: 自研究 1949-1965 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无疑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遗憾的是国际学界尚未对此引起充分重视, 无论是中文著作还是英文著作都鲜见中国外交部档案的使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学者普遍对中国外交部档案了解甚少, 以为中国外交部档案开放数量少、层次低, 缺乏有关外交决策过程的文件。事实上, 2004-2008 年, 曾出现中国外交部档案开放的黄金时期, 这期间解密档案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学术价值之高, 可谓史无前例。近年来,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再度收紧, 错过黄金时期的学者已很难再看到中国外交部档案的相关内容, 是为可惜。笔者有幸接触过中国外交部涉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解密档案, 故本文分国别就涉及中越、中老、中缅、中印尼、中马与中新关系的外交档案分门别类做梳理介绍, 望为从事相关研究之学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 东南亚各国; 中马关系

作者简介: 吴尔蓓密,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 冷战时期的中马关系, 冷战时期的中新关系, 新马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 新马各地中华总商会史, 冷战时期的香港与东南亚等。邮箱: psychegoddess1101@163.com。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

* 本文是中国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15@zh009)的阶段性成果。

任，上海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资深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领域：冷战国际史、苏联史、中苏关系、朝鲜战争。邮箱：shenzhihua0420@vip.sina.com

Tit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C's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Declassification of Diplomatic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1949-1965)

Abstract: For those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PRC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are undoubtedly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value. Unfortunatel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has not given this adequate attention, and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scholars rarely refer to these declassified material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neglect is because scholars in general have little knowledge of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archives, assuming that the number of declassifications are small, of low significance, and providing little insights into the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fact, the year 2004 to 2008, can be seen as the golden era of openness of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archives, during which time an unprecedented numbers of documents containing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with high academic value, were declassified. However, because access to the archives has become more restricted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who missed out during the golden era now have difficulties examining these materials. Since the autho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s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China's interaction with the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she will introduce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se materials as pertain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Vietnam, China-Laos, China-Indonesia, China-Malay (Malaysia), China-Singapore and so on. The author hopes that fellow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will gain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this brief presentation.

Keywords: PRC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Declassified archives; Southeast Asia;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uthor: Wu Erbeimi, PHD Candidate, Cold War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ion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Research inter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a (Malaysia), China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diplomac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ce their independences; the histories of the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Malaysian and Singap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n during the cold war. Email: <psychegoddess1101@163.com>

Shen Zhihua is a Lifetim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est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Senior Fellow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nd honorary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oviet History, especially the histories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 Email: <shenzhihua0420@vip.sina.com>

一、前言

2004 年至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分批解密了 8 万多件档案，时间总跨度从 1949-1966 年。其中，2004-2005 年开放第一批，时间跨度为 1949-1955 年，开放数量占这一时期档案总量的 30%；2006 年开放第二批，时间跨度 1956-1960 年，开放数量占这一时期档案总量的 60%；2008 年开放第三批，时间跨度 1960-1965 年（实际开放的档案，有部分延伸涉及到 1966 年），开放数量占这一时期档案总量的 70%。详情见下表：

中国外交部档案解密情况列表^①

开放批次	起止时间	正式开放时间	开放卷数	总计
第一批	1949-1955	2004年1月16日	4000多卷	15003卷
		2004年7月19日	5000多卷	
		2005年1月10日	5706卷	
第二批	1956-1960	2006年5月10日	25651卷	
第三批	1961-1965	2008年11月12日	41097卷	
总计	81751卷			

数据来源：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借阅处。

在解密的这八万余卷档案中，涉及东南亚各国的部分，笔者粗略统计有 13623 卷，其中越南 4209 卷，印尼 2486 卷，缅甸 2416 卷，柬埔寨 1495 卷，老挝 1490 卷，泰国 151 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127 卷，菲律宾 69 卷。

总体而言，中国外交部有关东南亚各国问题的解密档案，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国驻外机构对驻在国内政的报告，如 1955 年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各政党的动态报告，1962 年缅甸大选情况报告，1960 年 12 月老挝军事政变情况报告，泰国国内派系之争报告，等等；二是中国与该国关系的档案，如 1954-1960 年中柬关系大事记，中国对老挝的援助问题，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导人历次互访情况，东南亚各国的华侨问题，等等；三是关于该国与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主要是美苏）及国际组织关系的档案，如缅甸与美国关系，印尼退出联合国问题，柬埔寨反美斗争，等等。

本文主要对第二类，即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解密档案，包括中越关系、中缅关系、中印尼关系、中柬关系、中马与中新关系档案，分国别就内容作一一梳理介绍。

^① 本表转引自：乔娜：《新中国外交档案的解密与开放及其影响分析》，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39 页。

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解密外交档案介绍

1. 中越关系档案

关于中越关系的档案，包括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中越贸易，华侨问题，中越边界问题，以及少量有关领海问题的资料，如越南舰艇对南沙群岛侦察及活动情况。

(1)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中国对越援助档案包括，越南要求中国提供援助的来往文件和照会，中越双方就经援项目开展的会谈简报，越方和中方提出的援助项目清单，双方达成的议定书，视察援越工程情况的报告，援款及其使用情况的报告，中国援助越南工作动态报告，有关人士谈调整中国援越项目的意见等。档案记录的援助项目包括农业、工业、交通、技术设备等，例如：援助越南大米，援助越南建立8个军垦农场和1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帮助越南发展300万亩橡胶，帮助越南建设电台，协助越南建立民航机构，援助越南建设铁路，援助越南建立火柴厂，支援越南修建石拱桥，赠送旋风25型直升机等。

(2) 中越贸易

中越贸易档案大多数是关于中越之间各种议定书、协定书的起草、追认、换文、修改、补充、续签等情况，协议书的内容涉及贸易结算、货物交换、货币兑换、边境小额贸易、边境地方国营贸易公司贸易、航空运输、铁路联运、海上运输、过境运输、北部湾帆船渔业、通商航海条约、合作修建北仓河大桥等。

其中有大量关于中越贸易情况的总结报告，包括驻越使馆商参处发回中国的越南经贸情况季度、年度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交的中越非贸易货币比价和清算问题的报告，中国和越南贸易谈判情况的汇报等。报告内容涉及边境小额贸易的占有较大比例，并可分为两类：一是中越边境各省的小额贸易情况，如广西与越南北方边境省份小额贸易情况，云南省与越南边境省份小额贸易情况，广东省与越南边境省份小额贸易情况；二是中国政府对边境小额贸易的政策意见，如外贸部关于解决中越边境小额贸易存在问题的若干意见，边境小额贸易管理办法等。

(3) 中越外交往来

中越领导人、代表团互访的档案很多，以下几次访问情况资料开放较全面：1954年、1961年、1965年、1966年范文同访华；1955年胡志明访华；1956年、1960年周恩来访越；1960年越南经济代表团访华；1960年、1965年越南副总理阮维桢访华；1961年越南经济代表团访华；1962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华；1962年彭真率领人大代表团访越；1963年刘少奇访越；1965年、1966年黎清毅访华。这几次访问的重要讲话、宣传报道、会议简报、联合声明、工作总结等档案均解密开放。涉及的重要主题有：越南基本建设工作、越南经济五年计划方案、中越贸易、对越援助、越南革命形势、越南战争局势等。

(4) 华侨问题

有关越南华侨问题的档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调查与工作报告，例如关于越南侨民情况调查报告，关于外侨学校情况调查报告，驻越领事馆侨务工作总结报告；第二类档案有关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例如关于越南侨务和华侨返越定居政策，安排越南侨民到国营农场就业政策，越南征询中国对有关外侨管理问题的意见；第三类是个别具体事件的资料，例如关于吴庭艳当局强迫华侨加入南越籍的资料，台湾当局撤运南越华侨到台湾的资料。上述档案内容涉及伤害华侨问题，侨民国籍问题，侨民回国问题，侨民汇款回国问题，侨民购买公债问题，华侨偷越过境问题等。

1. 中老关系档案

关于中老关系的档案，包括老挝领导人及代表团访华情况档案，中老边境情况档案，中国对老援助档案，中国在老挝设立外交机构的档案，台湾当局在老挝制造“两个中国”问题的档案。

(1) 老挝领导人及代表团访华情况

档案所记载的来华访问的老挝领导人有梭发那·富马首相、贵宁外相、老挝国王、苏发努冯亲王及其夫人、副首相兼财政大臣富米·诺萨万、老挝卫生大臣高拉、老挝驻越大使陶宁；来华访问的老挝代表团有老挝军事代表团、老挝王国政府友好代表团、老挝佛教代表团等。档案内容包括，两国来往信件电报、代表团人员名单、接待计划、日程、双方领导人谈话记录、访华简报、联合声明等。

(2) 中老边境情况

中老边境情况档案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与老挝边境省份的情况，中老边境地方当局会晤情况，中老边境动态及涉外问题，中国边民进入老挝境内事，处理老挝边民持枪进入中国境内事，中国云南省与老挝北部四省代表团边境谈判报告记录，云南与老挝丰沙里边境贸易问题，西双版纳地区中老（挝）边界的画法问题。

(3) 中国对老挝的援助

档案所反映的中国对老挝的援助包括经济、军事援助、公路建设援助、医疗与教育援助。其中关于经济援助的档案包括，老挝要求援助的来往电报，中国援助物资清单，中老贸易协定的商谈记录，老挝年度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方案，老挝财政经济和外援情况的资料。军事援助档案较少，主要涉及对老挝坎温部队的零星援助，和中老军事援助谈话记录。公路建设援助档案，最主要的是关于中国援助老挝修建孟腊至丰沙里的孟丰公路的资料。医疗、教育援助档案主要包括老挝领导人子女、留学生在华学习情况，老挝儿童赴华学习事宜，老挝领导人来华治病记录，中国派专家、医疗组去老挝档案。

(4) 外交机构的情况

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在中老正式建交和互设使馆、领馆前，中老先互设了经济文化代表团，解密档案中有较多关于中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的内容。包括，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的调研提纲，工作总结，对老挝形势的展望，年度工作规划，本季度工作重点，对外活动（例如，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同他国代表人物的谈话记录），对外活动小结，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内部情况简报等。

使馆、领馆：包括老挝驻华使馆、领馆和中国驻老挝使馆、领馆。老挝驻华使馆、领馆的档案，内容涉及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馆筹建工作，老挝驻昆明总领事委派、到任等事，老挝首任驻华大使坎京的资料，老挝决定关闭驻昆明总领事馆问题，老挝昆明总领事馆闭馆后的有关问题。中国驻老挝使馆、领馆的档案，主要内容有这些机构的工作总结，工作规划及批复，专题调研报告，外交部对其对外活动的指示。

其他：其他具有外交性质的机构还包括中国驻桑怒工作组，驻康开代表团，驻老挝记者组。相关档案主要是这些组团的工作报

告、总结，工作中遇到问题的上报。另外，驻康开代表团被美机轰炸，档案中有对此事件的重要记录。

(5) “两个中国”问题

这部分档案主要包括，对台湾当局在老挝制造“两个中国”问题的情况报告，驻老使馆关于粉碎“两个中国”的斗争总结，中国就台湾当局使馆在万象活动情况与侨民的谈话记录，抗议老方制造“两个中国”事件的记录（例如湄公河委员会挂蒋帮旗问题，老挝右派报刊污蔑毛泽东主席和右派派军官去台湾事），中国与老挝就“两个中国”问题进行交涉的记录，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国就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与老挝的交涉。

3. 中印尼关系档案

中印尼关系档案涉及的重要主题有：中印尼外交往来、中印尼经济关系、印尼华侨问题、在印尼的蒋介石集团、西伊里安问题及其他。

(1) 中印尼外交往来

中印尼领导人、代表团互访的档案很多，资料开放比较全的是以下几次访问情况：1955年印尼总理阿里访华，1956、1961年苏加诺两次访华，印尼国会代表团访华，1957年哈达访华，1959、1963、1965年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三次访华，1962年苏加诺第二夫人哈蒂妮访华，1963年印尼外长助理苏佩妮夫人访华，1965年印尼经济代表团访华；1961、1964、1965年陈毅三次访问印尼，1961、1963年刘少奇两次访印尼，1961年毛泽东访印尼，1963年贺龙访印尼。这几次访问的邀请函、日程安排、接待计划、会谈记录、酒宴讲话、照片、机场告别等详细记录均解密开放。中印尼互访涉及的重要主题有：中印尼两国关系、反帝反殖问题、不结盟国家会议、西伊里安问题、第二次亚非会议、科伦坡六国会议、印马对抗问题、印尼退出联合国、中苏关系问题、印尼和苏联关系问题等。

(2) 中印尼经济关系

中印尼经济关系包括中印尼贸易和中国对印尼的经济技术援助。

中印尼贸易档案主要涉及中印尼贸易协定、支付协定、贷款协议、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谈判、签订、核准和延长等情况。各类贸

易协定内容除商业协定外，还包括海运协定、航空协定、广播电视合作协定。

中国对印尼经济技术援助档案，包括中国向印尼供应大米、棉花、大豆种子、体育器材、车辆、轧花设备等材料，和中国援助印尼建设纺织厂、造纸厂、水泥厂、冷藏船等的资料。其中，1965年中国援建印尼新兴力量国会大厦的资料非常多，内容涉及建设新兴力量会议大厦设备材料供应问题，成立援印尼新兴力量会议大厦领导小组问题，建设新兴力量会议大厦的议定书，中国建筑专家驻地被检查问题，印尼安塔拉通讯社对中国援助新兴力量会议大厦工程造谣问题等。另外，有少量关于中国军援的资料，主要涉及印尼空军，如印尼空军要中国提供军用飞机备件等问题。

(3) 华侨问题

中印尼关系档案中关于华侨问题的占据了大部分，印尼华侨问题档案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印尼华侨概况档案，二是双重国籍问题档案，三是印尼排华反华事件档案，四是撤侨问题档案。

印尼华侨概况档案，包括旅居印尼的华侨人数、国籍分布、侨汇等情况的数字估计，华侨小商贩情况，印尼加里曼丹地区华侨华人有关情况统计表。

双重国籍问题档案涉及中国、印尼双重国籍条约的谈判、达成、批准、签订、执行和宣传情况，印尼华裔对选籍的看法、态度，中国与印尼双重国籍条约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会议记录（共21次）。

关于印尼排华反华事件，档案资料最多的是印尼政府取缔华侨小商事件、迁逼华侨事件、芝马圩惨案和1963年反华骚乱。档案内容包括这些事件的发生、各方舆论、官方外交交涉、民间抗议等情况。

撤侨问题档案，包括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回的组织撤侨情况的报告，国务院关于接待华侨工作的意见，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政策文件汇编，印尼关于华侨返回中国的草案，印尼阻挠中国撤侨的情况，中国就印尼阻挠撤侨问题与印尼外交部交涉情况，中国与印尼进行遣侨协议谈判的情况，遣侨协议工作小组的会议情况（共9次）等。

(4) 在印尼的蒋介石集团

关于在印尼的蒋介石集团档案，主要涉及蒋帮分子在印尼的破

坏活动和印尼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包括蒋帮分子对印尼叛乱的援助和印尼政府对蒋匪的打击，蒋帮分子伤害华侨的事件，印尼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其中印尼拒绝台湾当局参加在印尼举办的第四届亚运会这个外交事件，有较详细的资料，包括中印尼领导人就此问题的谈话记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阻止台湾当局参加亚运会向中国政府提交的斗争对策以及中国政府的回复指示。

(5) 西伊里安问题

中国外交部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档案，主要涉及中国对西伊里安问题的了解和中方的态度、立场。相关资料包括中印尼两国领导人围绕西伊里安问题的会谈记录，中国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的外交文件，印尼感谢中国支持收复西伊里安斗争的来照等。另有少量档案记录了印尼华侨报名参军支持印尼解放西伊里安的情况。

4. 中東关系档案

中東关系档案主要涉及的主题有：中東外交，中東经济关系，中東佛教关系等。

(1) 中東外交

中東外交档案包括中東关系大事记（54-60年），中東双方国家领导人谈话记录和往来电报，中東领导人、代表团互访情况，重要的有1964年中国高层领导与柬埔寨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965年西哈努克访华情况的详细报道，1964年中東经济代表团的互访情况，1965年宋双访华与李先念、周恩来等的会谈记录，1966年李先念访问柬埔寨的情况。

(2) 中東经济关系

中東经济关系档案，包括中東贸易协定、支付协定的达成和修改，中国对柬埔寨的经济援助、医疗设备援助、捐款情况，中国赴柬专家委派情况、赴柬专家组工作情况。

(3) 其他

其他有关中東关系的档案，主要有中国与柬埔寨佛教关系的资料，柬埔寨华侨基本情况和国籍问题的档案，柬埔寨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做法和提案，柬埔寨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反应，柬埔寨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等。

5. 中马与中新关系

关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档案总共只开放了 127 卷，由于档案所涉年份为 1949-1965 年，而这段时期中马与中新之间没有直接的政府间往来，因此中马以及中新关系档案十分稀少。鉴于笔者曾仔细阅读过中马、中新关系档案，故在此对为数不多的几份档案做详细介绍。

涉及中国与马来亚英殖民当局关系的档案有，1950 年英国承认新中国后，中国希望在马来亚设领，在《关于马来亚领事问题的综合报告》中对领事将要承担的重任、可能面临的困难做了详细的分析和预计。报告指出，由于新、马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同时又是南洋华侨重心地区，马来亚领事（尤其是吉隆坡、新加坡总领事）的重要性不亚于驻英大使。1950 年，《南侨日报》和《现代日报》被封，报社人员遭到逮捕，时任《南侨日报》社长的胡愈之请求中国政府从外交途径予以支援，中国外交部档案详细记录了中国政府对此事的考虑与应对措施，以及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外交部、中宣部关于南洋华侨报纸宣传问题的讨论及意见，新闻总署办公厅关于华侨新闻业受到马来亚、印尼等国当局迫害情形的报告。1950 年 12 月 4 日，北京归国华侨联谊会举行大会，会上因揭露英国政府迫害马来亚华侨的暴行而引起全体与会人员愤慨，全国总工会、全国民主妇联、全国民主青联及全国学联联名致电英政府首相艾德礼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特就此事发表声明，要求英国政府以及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停止迫害和驱逐华侨的政策，立即释放马来亚集中营全部华侨，保障他们生命财产安全与其他一切正当权益，赔偿他们由于非法迫害所遭受的一切损失，中国外交部档案收录了此份声明全文。1951-1956 年，马来亚殖民当局跟随英美实行对华禁运，中国外交部档案收录的 1955 年《马来亚情况简报第 4 期》报告了马来亚各界人士欢迎中国工业品和反对美国“禁运”的情况，反映了禁运时期中马经贸往来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并取得发展。1956 年新马工商业贸易考察团访华，有关档案记录了随团访华的记者名单。1957 年马来亚独立前夕，马来亚华商请中国代制拉赫曼丝织像，此事也记录在外交部档案中。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中马两国政府间虽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无直接往来，但是外交部仍有少量档案反应了独立前后这段具有历史性意义时期的中马关系。比如，马来亚独立前夕，马驻英高级专员与驻巴基斯坦专员分别邀请中国驻英代表与驻巴代表出席其于8月31日举行的宣读独立宣言、升旗仪式和独立招待会，由于中国代表是否应邀出席关系到中国对马来亚独立持何态度，于是中国驻外代表纷纷就此事电询外交部，外交部回复指出马来亚在英联邦内独立，虽然是不彻底的，但这是马来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也是亚非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应该支持，可以出席。8月31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兼外长分别致电马最高元首和马总理兼外长表示祝贺和承认。9月初，外交部档案显示中国政府进一步对马来亚独立情况作了分析，包括对马来亚独立后的新宪法、对外政策、与英国保持何种联系、对中国的态度、对内继续实行剿共与民族歧视政策等情况的了解与评估。9月底，外交部亚洲司编写了《马来亚的外交政策和对我国的态度》，专门对马来亚独立后拉赫曼政府的对外政策做了重要判断。1959年，马来亚政府颁布新银行法令，中国银行吉隆坡和槟榔屿分行被迫关闭。中国外交部档案对此事件有详细的记录，从1958年10月30日至1959年4月18日外交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以及中国银行海外各分行的来往电报中，可见中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判断、采取的对策及其考虑的原因。

1963-1965年，“马来西亚”计划问题成为东南亚区域热点问题，中国外交部相关档案反应了中国对“马来西亚”问题的看法态度：1962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香港与中国接触，重点谈论“马来西亚”计划问题，以及华人问题、老挝内战问题、中印边界争端问题等，双方对此均严格保密，2008年解密的中国外交部相关档案反映了此次中新秘密谈话的有关内容。1963年7月17日，新华社国际部撰写《关于“马来西亚”有关问题的报道意见》呈送外交部，从中可见此时中国对“马来西亚”问题的看法态度与一年前与李光耀谈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中国外交部、侨委、调查部和总参二部等单位负责人紧急开会研究，立即决定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和争取新加坡，周恩来紧急批示同意。1965年8月12日，周恩来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华代表团团长陈文成，在谈话中陈文成问及中

国对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看法，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回答。

关于中国与东马的关系，从外交部档案来看，1959年底，砂拉越前亲王布鲁克要求自费访华，而中国方面因为对布鲁克的政治背景、政治态度与此行目的一无所知，外交部和中联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均无相关材料，一时不知作何回应，最后研究决定先由人民外交学会出面接待，并视情况而定是否让其接见中国高层领导。1960年1月1日，周恩来接见布鲁克并谈了世界和平、裁军、和平共处、举行和平集会等问题。中国与沙巴（北婆罗洲）关系的档案，仅有一件，反映的是从印尼东加拉根和巫劳地区偷渡到北婆罗洲的华侨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政府最后决定将这批华侨设法接回国的情况。

6. 中泰关系与中菲关系档案

由于中泰关系和中菲关系档案均十分稀少，在此一并做简单介绍，有关中泰关系的档案，内容涉及华侨问题，中泰两国来往的高层谈话记录、电报、信函，泰国各界人士及代表团访华情况，中国对泰国工作简报等。有关中菲关系的档案，内容涉及南沙群岛问题，西沙群岛问题，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文化往来情况，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

最后要提及的是，在这些档案解密后，外交部整理出版了有关东南亚问题的两册史料集：一册是以1954年日内瓦会议为专题的史料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该档案集共分五部分，收录文件219篇，以中国代表团在会内外各种外交活动为主线，集中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及为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所做的努力和贡献；^①另一册是以1955年亚非会议为专题的史料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该集共分六部分，内容包括亚非会议的筹备，中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会前准备、会间活动、会议结果和后续行动等，并附录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的专题材料。^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解密档案的学术价值

总体而言，解密档案最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历史学者可以利用它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历史叙事体系。利用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即可以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对一系列双边关系的叙事结构进行重建，进而甚至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整体叙事结构。具体而言，利用好中国外交部涉及东南亚国家问题的解密档案，我们可以在学术上取得以下的突破：

第一，通过对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的系统整理和利用，通过一系列实证性的个案研究，重写或合理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历史。在这方面，范宏伟：《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一书^①对中缅关系的系统论述可作为很好的范例。外交部档案解密之前，据笔者所见，只有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②在第九章中对新中国成立后中缅关系的全局有整体论述，但囿于原始档案材料的缺乏，其根据《新华月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写就的中缅关系史仅仅展现了中缅关系中友好、和谐的一面，无论是边界问题的解决、中缅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还是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发展都处处体现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反映出中缅关系发展的曲折、波动与起伏，也未能揭示国际关系现象背后的复杂动因。关于中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如中缅边界问题，观以往的研究，虽然一些论著的作者借其身份（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外交部资深外交官兼研究人员）之便，能够查阅并利用尚未解密的中共中央和外交部的相关文件，但这些研究主要还是以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原则、思想等为主题展开，赞扬周恩来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为开端，创造了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成功范例，形成了周恩来关于处理边界

① 范宏伟：《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

② 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问题的一整套科学理论，等等。^① 范宏伟的著作则得益于外交部档案的解密，在大量运用这批解密档案文件及其他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第一次勾勒出了中缅关系发展的完整脉络，揭示了此双边关系演变的复杂历程——建交初期缅方对新中国的怀疑和冷淡，1954年两国关系的转折性变化，1960-1961年双边亲善的高峰，1967年仰光6.26反华事件和双方关系的破裂，以及1971年的破镜重圆，从而颠覆了以往将中缅关系史视为“中缅友好史”的整体叙述结构。与此同时，作者在个案研究上，通过对解密的关于中缅边界谈判问题档案的解读，对这一谈判的过程和意义进行实证性考察，并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观点，即认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代表着双边关系发展的顶峰，但并不具有转折的意义”，因为“冷战时期，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受制于中国和美国、苏联的大国关系的发展格局，边界问题的解决会一定程度上缓和与推进与邻国的关系，但据此声称其改善了中国外交格局，使‘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恐怕有悖事实。”^②

第二，从中国的角度来解释有争议的国际事件，打破以往研究以“美国”、“英国”、“苏联”作为论述中心的范式。例如，对胡志明为何在日内瓦会议上向法国人做出让步，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已经明确增强了越南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对此，西方学者认为：胡志明可能是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要他向法国人做出让步，以诱使巴黎反对建立一个欧洲防卫共同体；而美国之所以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也是想借此换取法国对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的支持；由此，日内瓦会议后不久，法国国会否决欧洲防卫共同体议案的做法，则是对苏联的回报和对美国的辜负。从中我们可看到，西方学者是以美苏两大国的对抗为

① 相关文章见廖心文：《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宋凤英：《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文史精华》2005年第11期；姚仲明、沈韦良、左峻峰：《周恩来总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光辉业绩》，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相关著作见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1949-200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范宏伟：《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第77页。

观察视角来解释日内瓦会议的。^① 然而，中国学者李丹慧在其《日内瓦会议上中国解决印支问题方针再探讨》一文中，根据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的发言、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北京之间的电报往来、周恩来同与会各方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以及多年后毛泽东接见越南领导人的谈话等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再结合美国、俄国的解密档案，对有关日内瓦会议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见解。比如，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期实际已筋疲力尽，甚至一度希望退至中国边境，而由中国军队代其继续作战。根据武元甲（Vo Nguyen Giap）、胡志明（Ho Chi Minh）的估计，战场形势并未根本改观，并且法国有可能接受陈规东京湾的美国的援助。越南方面同意让步，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另外，根据中越柳州会议记录，越南最后接受让步，应该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是主要的劝说者，甚至后来毛泽东也因此自认失误，中越关系恶化的时候，还有文件显示越南领导人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对其施压的举动耿耿于怀，积怨颇深。在剖析外交部解密档案的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随中国援越抗法行动的变化而调整，美国无意直接军事卷入战争，而以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御联盟为主要目标。中国已看出美国不可能大举干涉印支战争，故从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出发，解决印支问题的核心目标从防止美国扩大战争转变为阻止美国以搞军事基地、军事同盟为手段插足印支。中国通过妥协换取了日内瓦协议的签订。协议约束了美国的行为，也约束了中越结盟的可能，中立的老、柬成为美英法与共产党中国冷战对峙的缓冲垫。就当时的局势来说，美国不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中越不结盟的结果，或许是解决印支问题最好的出路。^② 这篇文章补充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所扮角色研究不足的欠缺，得出了更为全面的结论。可以说，运用中方档案，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估冷战史的重大课题，应该成为中文世界学者的优势和特色。

第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关注中国对东南亚外交中的经济、宗教、文化、社会因素，促进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心理战等新兴研究的发展。例如，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马来亚联

① 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9、271、285页。

② 参见李丹慧：《日内瓦会议上中国解决印支问题方针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8期，第27-41页。

合邦政府在1959年3月28日发表的“共产党对马来亚联合邦的威胁”白皮书，这份白皮书中马来亚政府将中共的文化输入、思想宣传视为严重“威胁”，而中共则将此视为“污蔑”。白皮书声称：“中国共产党目前向东南亚地区人民进行特别庞大的宣传运动……这项宣传工作意图拉拢东南亚国家使其脱离其一向与非共党集团的关系，籍以削减非共党集团的力量，而制造有利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与政策的气氛，进行把东南亚地区国家变成为共产国家的工作”，“中共不遗余力地通过出版物、电影、新闻事业、无线电广播、个人联系，由中共与其附属机构发起与扶助前赴中国大陆游历的访问团，以及贸易上的接触等等，来利用种族或爱国的情感，来诱导这些海外华侨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政体与协助这个新政体来进行其政纲”。^①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徐兰君对这份解密档案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正在策划的新书即是探讨冷战时期毛文化在东南亚的输出问题。笔者于今年4月在新加坡“东南亚与冷战：新档案与新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了徐兰君的新书撰写计划，她打算通过对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考察来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对香港南方影业公司总经理做过两年口述采访。而就笔者所见，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中即有一份“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关于新加坡新世纪影业公司购买国产影片的报告”^②，其他与文化冷战相关的材料，中国外交部档案中还有很多。此外，中国外交部档案中关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和贸易政策的材料非常多，在冷战时代，经济援助和贸易政策往往是政治意图的侍女，对于有志于研究“经济冷战”的学者而言，中国外交部档案也是一座宝库。例如向丽华的博士论文《经济援助外交“杠杆”建构研究》，即依据外交部解密的大量中国对越援助档案，对经济援助外交的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与检验；^③范丽萍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透视》一文中则运用解密外交档案和柳州铁路局档案，以冷战时期中越铁路国际

①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在3月28日发表“共产党对马来亚联合邦的威胁”白皮书中有关对我诬蔑的摘要，1959年3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715-01。

② 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关于新加坡新世纪影业公司购买国产影片的报告，1961年3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923-04。

③ 向丽华：《经济援助外交“杠杆”建构研究——以冷战时期大国经济援助外交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联运中的货物运输为视角来审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指出，从中越铁路国际联运的低水平发展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集团内部加强凝聚力的难度。^①

结 语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涉及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档案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学术价值之高，应该引起各国学者的充分重视。遗憾的是，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中国外交部档案的利用还远远不够。

笔者所见的对中国解密外交档案的利用情况，除前文所述几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和著作外，关于中柬关系研究，仅见美国奥本大学的翟强教授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探讨了 1954-1965 年的中柬关系，提出从 1954 年到 1965 年，中柬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戒备冷漠到友好合作的过程，逐步形成类似“统一战线”的特殊关系。^②

关于中老关系，2012 年外交学院一篇硕士论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对 1960-1965 年中国援助老挝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但已有学者指出其文有多处错误结论，有待进一步探讨。^③ 另有冯一鸣的《“革命”与“中立”之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前中国对老挝政策探析》一文，以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结合美、英、俄、法等国解密档案文献资料，从中国外交的角度，重点考察了 19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老挝局势趋紧至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初期中国对老政策的嬗变经过及相关考量，分析了中方政策的实施效果及与他国政策的交互碰撞。^④

① 范丽萍：《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透视——以 1955-1978 年中越铁路国际联运中的货物运输为视角》，《东南亚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② 翟强：《中柬“特殊关系”的形成（1954-1965）》，《南洋问题研究》2013 年第 1 期。

③ 陆明生：《中国对老挝援助研究（1960-1965）》，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 年。

④ 冯一鸣：《“革命”与“中立”之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前中国对老挝政策探析》，提交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和中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背景下的中国边疆问题——基于档案资料的研究（含台、港）（New Sourc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Frontiers

至于中泰、中马、中新关系，成果更是乏善可陈。关于中泰关系，北大博士生王阳林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论述了中泰关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①关于中马关系，吴尔蓓密的《1958年马来亚中国银行关闭事件探析》^②一文，利用外交部解密档案分析了中国政府对独立后的马来亚政府关闭中国银行一事的性质判断、态度立场与应对措施，及此事件对此后数年中马经贸关系的影响。而关于中菲关系，以及高度敏感的南海问题，则尚未见以一手外交档案为支撑的学术成果。当然，这种情况也与中国与上述几个国家建交本身较晚，外交部档案开放本身较少，以及所涉及问题高度敏感有相当关系。

相比较而言，中印尼关系外交档案利用情况较好，近年来发表的论及印尼华侨问题、中国对印尼援助、中印尼关系和亚非会议问题的多篇文章都利用了外交部档案，就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③例如，在中国外交部档案解密之前，由于缺乏中方资料，有关学者对中印尼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回避中国的决策过程，而重点研究印尼内外政策的互动。在此研究框架下，中国只能被处理成被动反应的角色，曾雨棱的硕士论文《革命外交视野下的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 1961-1965》，则以解密的中国外交部印尼问题档案为基

during the Cold War) ”高级研修班论文，2014年8月4-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August 4-8, 2014,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C)。

- ① 王阳林：《20世纪50年代中泰关系中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 ② 吴尔蓓密：《1958年马来亚中国银行关闭事件探析》，《“粤籍华侨与冷战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11月。
- ③ 见周陶沫的相关中英文论文：《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解析1959-1962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No.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Ambivalent Alliance: Chinese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1960-1965*, CWHIP, Working Paper#67, August 2013。许振政：《1958-1959年间印尼保守华人群体衰亡的背景和缘由》，《暨南学报》2011年第1期；张小欣：《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01期，第91-98页；李一平、曾雨棱：《1958-1965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邢一：《中国—印尼外交关系研究：1956-1960》，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曾雨棱：《革命外交视野下的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 1961-1965》，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李潜虞：《试论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政策的演变》，《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

础，结合报刊、回忆录和其他档案文献，以中国作为论述主体，对中国对印尼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解读。同样，周陶沫在其《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一文中，利用解密外交档案对印尼排华所引起的中印尼外交纠葛和中国方面的决策应对做了新的解读。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印尼关系的系统论述方面并未因中国外交档案的解密而出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专著。鉴于中国外交部有关印尼档案的开放数量较多、层次较高，学者在中印尼关系研究方面应有更高建树。

对外交部中缅关系档案的利用和中缅关系的系统研究算是最成熟的，除前文所述的范宏伟教授发表了多篇论文^①和有影响力的专著外，还有关培凤、齐鹏飞等学者也在此方面做出了学术贡献。^②即便如此，在系统论述中缅关系问题上也更多地只是呈现了范宏伟的“一家之言”，远没有形成学术争鸣之势。

综上所述，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领域还留有大片空白，笔者希望拙文能为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并唤起广大学者对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的重视与利用。

① 范宏伟有关中缅关系的论文有：《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中缅关系中的华侨问题》，《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建交初期（1949-1953）的中缅关系》，《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冷战时期中缅关系研究（1955-1966）——以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中缅关系的转折：1954年——以外交部解密档案为视角》，《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5期；《奈温军人政权的建立与中国的对缅政策——兼论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选择》，《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关培凤：《中缅边界谈判研究》，《史林》2014年第1期；《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缅边界谈判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齐鹏飞、张明霞：《中缅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冯越、齐鹏飞：《中缅边界谈判述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来稿须知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是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范围涵盖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关系有关的研究课题，学术领域不限。本刊拟定于2014年创刊出版，为半年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在此，本刊敬请作者投稿时注意如下事项：

1. 来稿要求选题新颖、论点明确、论据可靠、论证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图表清晰。全文（包括图、表、参考文献和英文翻译等）篇幅不宜超出一万字。

2. 文稿顺序：篇名，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和联系方式（以上皆需中英双语），正文、注释，参考文献。

3. 篇名：简明、确切地概括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不超过20字，必要时可以加副篇名。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英文篇名与中文篇名含义一致。

4. 作者署名及工作单位：宜署真实姓名。工作单位标明全称。多名作者的姓名之间用逗号隔开。

5. 摘要：客观地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不超过300字，不分段，不用图表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或术语，不引用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要相对应。

6. 关键词：反映论文的主题概念，一般标注3-6个，用分号隔开。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7. 正文：字体宜用宋体 12 号；正文内多于四行的引文请另外分段，且用楷体。

8. 注释：引文出处或用于对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如：

- ①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第 262 页。
- ②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 年第 111 期，第 103 页。
- ③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 年，第 19 页。
- ④ Voltaire: *Candidate and Zadig*.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168.

9. 参考文献：采用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列于正文之后。如：

- ①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 年。
- ② Voltaire: *Candidate and Zadig*.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 ③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
- ④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 年第 111 期。

10. 作者简介：介绍作者的姓名、职称、学位、主要作品和研究方向。

11. 联系方式：能够与作者及时沟通的电子信箱。

12. 来稿一律采用中文简体。本刊提倡通过电子邮件投稿，并通过电子邮件与作者联系。请密切注意电子信箱，以免联系不畅，耽误时间。

13. 切勿一稿两投，违反者（包括所有署名作者）将在一定时段内被禁止在本刊发表论文。

竭诚欢迎广大新老学者踊跃投稿。

本刊编辑部地址：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联系方式：

电话：+(603) 79565663

传真：+(603) 79565114

邮箱：ccs2014ics@gmail.com, chinastudies@um.edu.my

网址：<http://ics.um.edu.my/>

